

	2017年8月7日(星期一) 准备会议	2017年8月8日(星期二) 圆桌会议	2017年8月9日(星期三) 综合讨论	2017年8月10日(星期四) 解散
9:00		【1】9:00~10:40(主持人:村和明、彭浩) 发表人:四日市 康博 (提问者:赵 阮) 发表人:朝克图 (提问者:额尔敦巴特尔) 发表人:桥本雄 (提问者:李 命美)	【总体讨论】 主持 刘杰 论点整理 赵珏	早餐后退房 check out time 10:00
10:00		休憩		
11:00		【2】11:00~12:40(主持人:徐静波、娜荷芽) 发表人:额尔敦巴特尔 (提问者:四日市 康博) 发表人:向 正树 (提问者:チヨグト) 发表人:孙卫国 (提问者:金 甫桃)	全体讨论	10:00~12:00 执行委员会@国际会议 ★仅限执行委员
12:00			总结 三谷博	
13:00		午餐@国际会议餐厅	【参观】 12:30 从会议出发(车内用餐 盒饭)	
14:00	住宿地点:JR九州宾馆小仓 http://www.irk-hotels.co.jp/Kokura/index.php	【3】14:00~15:40(主持人:韩承勋、金Kyongtae) 发表人:金 甫桃 (提问者:其林道尔吉) 发表人:李 命美 (提问者:孫 衛國) 发表人:其林道尔吉 (提问者:张 佳)	↓ ↓ 元寇纪念馆 ↓ ↓ 生松原元寇防垒遗迹	
15:00	check in time 15:00 ※参会人员请于16:00在国际会议集合	茶叙		
16:00	【开会】16:00~19:00(司会:李恩民) 致辞/会议宗旨 三谷博	【4】16:00~18:00(主持人:金范洙、李恩民) 发表人:赵 阮 (提问者:桥本 雄) 发表人:張 佳 (提问者:向 正树)		
17:00	基调演讲 葛兆光	提问与讨论	↓ 太宰府 ↓ ↓ 血仓山顶上(小吃)及夜景 ↓ ↓ 20:40 到达小仓站	
18:00	参会人自我介绍			
19:00	晚餐@丽嘉皇家酒店	晚餐@观山庄 分馆		

※橘黄色部分的会议均配备有同声传译

东征日本中高丽忠烈王的政治意图

金 甫 桃（嘉泉大学）

蒙古帝国的出现与扩张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蒙古曾经入侵高丽，深刻地影响着高丽。我们将蒙古影响高丽的时期大致分为战争发生时的“抗蒙”时期以及战争结束后“干涉期”。第二次进行的“东征日本”则发生在第二个时期。蒙古希望高丽能够降伏日本，要求诏谕日本，结果诏谕不成，之后蒙古军同高丽军一同讨伐日本，开疆拓土。

过去，学术界倾向于认为“东征日本”是一场由蒙古主导，高丽参与的战争。但是事实上当时的高丽国王（元宗与忠烈王）在第一次远征后，曾怀抱消极回避的态度，但之后又积极地加入作战，态度曾发生转变。本文中，我们不谈“东征日本”事件，而是着重探讨引起忠烈王态度转变的原因，分析忠烈王改变立场的意图以及政治目的。

近来，学术界不断有人讨论 13 世纪中后期忠烈王的政治立场。最近研究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于高丽立场的改变。换句话说就是不再强调高丽倚靠蒙古而发起的这场战争，而是着眼于当时在蒙古深刻影响下的高丽以及高丽的国王是如何运用当时的时局，影响高丽 - 蒙古两国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忠烈王的地位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他是高丽的国王，又是高丽蒙古王室联姻第一人，之后又成为蒙古最高地方长官——“征东行省”的丞相。但是做蒙古的驸马，是高丽率先提出的联姻；征东行省虽是由蒙古设立行政机关，但忠烈王也在行省内部拥有自己的权力。换言之，高丽的国王，也就是忠烈王，他凭借着蒙古的力量确立自己的王权，扩大自己的权力，通过成为驸马，丞相，以期达到自己政治上的目的。

1170 年之后的 100 年间，武臣政权，高丽的王权被不断地削弱。1270 年武臣政权垮台，王权重新执掌朝政，但是鉴于当时与蒙古之间的关系，高丽改变了诸多现有的机制。忠烈王与忽必烈之女忽都鲁揭里迷失联姻，形成了高丽与蒙古之间的王室联姻，并且依照蒙古的要求，将以中书门下省等 6 个部门为中心的官制，降格为由僉议府和其他 4 个部门组成的体制。另外像达鲁花赤这样蒙古的官员，军队也在高丽常驻。这种变化成为保证高丽王权稳定，扩张的决定性因素。

蒙古曾派遣使臣赵良弼劝降日本，外交接触失败之后，立即准备发动战争。使臣的派遣以及第二次东征日本都得到了高丽的支持。蒙古第一次远征日本，高丽曾在 1274 年派遣 30500 人，建船 900 艘，士兵 6000 名，水夫 6700 名。而在 1281 年第二次远征时，则派出战舰 900 艘，战士 10000 名，水夫 17000 名。所以这样庞大的人力物力支援给高丽带来沉重的负担，高丽内部产生严重的混乱，也曾多次申诉。

如果我们在政治层面上分析忠烈王，可以看出高丽在经济上的诉求与他的政治目的不存在关联。忠烈王虽然曾经申诉远征带来的严重经济负担，却并没有反对出征，反而时常表现出支持的样子。特别是他指出第一次远征失败的原因是蒙古军与高丽军指挥部出现混乱，所以第二次远征时特别强调指挥统一的重要性。他还特别任命高丽的将领为万户职，赐予他们金牌，要求按照蒙古的官制赐予他们指挥权，以保证两军的统一。蒙古准许了忠烈王的要求，并任命高丽王也就是忠烈王为征东行省丞相。从此，高丽王开始兼任行省的丞相。

忠烈王在以下 3 个方面倍受关注。首先，利用蒙古对东征日本的强烈意愿来强化自己王权，为此，忠烈王还特别强调沿袭蒙古的风俗习惯以及制度。他作为驸马，强调自己是蒙古统治阶级一员，提供了蒙古认证他王权的名分。由第一点延伸出第二点，忠烈王向蒙古请求指挥权，并授予高丽的将领，形成高丽军与蒙古军的一元指挥体系。最重要的是，实际上忠烈王能够将蒙古军事制度里的“万户”，自行任命给高丽将领。第三点，蒙古不仅准许忠烈王对于指挥权的要求，更是任命忠烈王为行省丞相，认可高丽王的贡献。

我们可以说，在东征日本的准备过程中，忠烈王扩大自己王权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从忠烈王成为丞相这一点来看，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预期的目标。

原著：韩国語、译者：羅奇

【论文】

举向元朝进贡，穆斯林商人的贸易活动也日渐活跃，南海贸易呈现出一片繁荣态势²⁸。然而，榎本涉指出，日本与元朝间的贸易实际上显示出与时代相违背的动向²⁹。如前文所述，日本与元朝之间的戎克船自元成宗铁穆耳统治时期的后半期才开始盛行，而战争后，尤其截止至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后半期，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完全不活跃。其根源就在于元朝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话虽如此，其原因并不是两次元朝入侵日本的战争（文永之战与弘安之战）的影响，而是元朝制定了第三次进攻日本的计划。即使是在日本商船恢复与元朝往来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入侵日本的计划也没有停歇。

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朝为了实施第三次入侵日本，设置了征东行省，并任命阿塔海、刘国杰、陈严、洪茶丘等人为宰相³⁰。次年，元世祖忽必烈宣布圣旨，要求暂缓进攻日本，优先进攻越南，同时由于临近高丽的东方三王家领的叛乱持续不断，因此进攻日本的计划被宣告中止，直至东方三王家领叛乱、越南战争、占婆战争、爪哇战争都结束后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该计划才再度被提上日程。高丽国王忠烈王对此表示赞同并开始为入侵计划做着相应准备³¹。然而，此时的元世祖忽必烈已经高龄，并于两年后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驾崩，第三次远征日本的计划便也随之告终。换言之，第一次和第二次入侵日本结束后的十年间，还不能称之为“战后”。倒不如说，只要条件俱全，第三次远征日本随时都有可能在忽必烈的指示下立即开展，因此将这段时期称为“战争即将发动时期”也不为过。与元朝相临近的越南、占婆国亦是如此。不过，与第三次入侵日本的计划最终流产不同，在两次日本战争之后，元朝对越南和占婆国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战争，甚至还在此之后向爪哇派遣了远征军。这一差异之所以存在，其最大的因素就在于越南、占婆国、爪哇都位于当时南海贸易主干线的主干道，而日本却远离当时元朝海上交通大动脉的主干道。与经由越南、占婆国的“西洋航路”不同，连接日本、琉球、福建、马尼拉的“东洋航路”直至16世纪以后，其重要性才逐渐凸显出来³²。此时，元朝优先经略的是经由南海通往伊斯兰各国的“西洋航路”沿线国家。这不仅仅是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还多半包含有经济和商业目的在内。不论是元朝发动的越南战争还是紧随其后的爪哇战争，都有一些负责招抚工作的随行人员与远征军同行，以笼络商人、增进贸易³³。但是，在入侵日本方面，却无法找到以振兴贸易为目的的随行人员出现在远征军中的记录。因此，说到底，经略日本只是元朝经略高丽与经略南宋计划的延长线上的一环。其结果正是由于背景不同，所以才导致了第三次入侵日本的计划无法实现。元世祖忽必烈驾崩后，次任皇帝元成宗铁穆耳于大德三年任命禅僧一山一宁为使节，促使日本向元朝进贡³⁴，但是与忽必烈时期相比，元成宗对待日本的态度明显弱化，已经不具备运用武力迫使日本接受册封的意图。元成宗铁穆耳朝之后，亚欧大陆中部地区的蒙古宗族之间的武力冲突不断，元朝针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海域国家的军事入侵也就逐渐减少。因此，可以说，自元成宗铁穆耳之后，日本与元朝的战争才终于迎来了尾声。日本与元朝的贸易逐渐盛行起来，也在此之后。

那么元朝与日本战争的前后，日本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据村井章介研究，日宋与日元之间的海外交易中存在贸易船只往返次数限制、日本人出海限制、禁止铜钱流通等规定，但这些规定曾经全部都流于表面功夫³⁵。然而，在元朝发动第一次入侵后，镰仓幕府开始采取具体且有实效性的限制措施。弘安四年（1281），镰仓幕府颁布法令限制外国人进入国内；正安二年（1300），给予镇西探题管理与监督外来人员的权限，并以“异贼防禁”为名强化了镇西探题的军事功能³⁶。村井认为，以此为契机，公权力逐渐渗透进了博多地区。作为博多组成部分的博多浜与息浜，其背后的支配者各不相同，阻碍了博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公权力的干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元朝与日本的战争产生的短期军事冲击转变为政治、经济、文化的长期冲击，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28 有关这一时期元朝的财政、商业政策及元朝与南海交易的关系，可参考四日市康博 2015(b) 的研究。有关马六甲海峡周边各港口王国的海上贸易情况，可参考深见纯生 2004、深见纯生 2006 的研究。

29 榎本涉 2006；榎本涉 2014

30 《元史》卷一三 世祖纪一〇 至元二十二年十月癸丑

31 《高丽史》卷二九 世家三〇 忠烈王三 忠烈王十八年〔八月〕丁未；卷三〇 世家三〇 忠烈王三 忠烈王十八年〔九月〕壬午

32 有关东洋航路和西洋航路相关资料，可参考四日市康博 2015(b) 的研究。

33 可参考四日市康博 2015(b)，26-29 页

34 《元史》卷二〇 成宗纪三 大德三年三月癸巳。该国书的复刻版保存在金泽文库（《金泽文库古文书》6773）

35 村井章介 2013(c)，264-266 页

36 镰仓幕府追加法四八八条（异国警固条）、七〇一条（牒使来着时在所并问答法事）（《中世法制史料集》第一卷，249 页，307 页）；村井章介 2013，265 页

尾论：究竟何谓“蒙古冲击”？

如果仅仅将日本作为主体来思考的话，人们往往容易认为“蒙古冲击”指的是战争本身为最大且具有主体性的冲击。事实上，传统的蒙古来袭研究，都主要将研究的焦点对准战争发生前的外交关系以及战争本身。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如果观察亚洲海疆各地域发生的具体事例，就会发现“蒙古冲击”实际上是一种“长期性的冲击”，绝非仅仅只有战争，正是战后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给社会和文化造成了巨大影响。更进一步可以确认的是，战争前与战争中产生的政治冲击对其之后的经济与文化冲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换言之，虽然元朝与日本（镰仓幕府、朝廷）双方都在战争期间对贸易和交往做了很多限制，而这些限制也对贸易结构本身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我们必须将这些状况和之后飘摇反复的贸易兴顺的状况作为一个整体的流程加以把握。正如前文中村井所述，日本在与蒙古交战后，立即强化了贸易管制，严格限制新的航船入境，由此，以在中国设置据点的汉商人（即“宋商”）为主体的贸易转变为以在博多设置据点的汉商人（“宋商”的子孙后代）为主体的贸易，汉商人甚至逐渐在日本定居，于是，贸易的主体最终在室町时代（中国明代）转变为以包括“宋商”子孙后代在内的日本商人。总之，镰仓及南北朝时代（中国元代）是中日贸易结构转变的过渡期，而且这一转变与元朝对日战争及其之后的冲击有着深刻的关联。

本文受限于篇幅，故不通过具体事例来说明日本受到的“蒙古冲击”的内容究竟为何，而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解释“蒙古冲击”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和政治上的冲击，这些短期冲击还带来了经济与文化上的冲击。关于本文主题的准确性，还必须将日本以外的地域纳入研究对象范围内，通过具体事例加以验证，而这，也是笔者今后的研究课题。

史料

- 《元史》：《元史》校对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
- 《蒙古字韵》：照那斯图、杨耐思（编）《蒙古字韵校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 《四明续志》：中国地志研究会（编）《至正四明续志》宋元地方志丛书，台北：中国地志研究会，1978。
- 《高丽史》：国书刊行会（编）《高丽史》上中下，国书刊行会，1977。
- 《孟轲录》：森铨三等（编）《随笔百花苑 6》东京：中央公论社，1983 所收。
- 《镰仓幕府法 追加法》：佐藤进一、池内义资（编）《中世法律史料集 第一卷 镰仓幕府法》东京：岩波书店，1955 所收。
- Marco Polo. Le Devisement du Monde (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Marco/F/Benedetto: Luigi Foscolo Benedetto (ed.), il Milione: Prima Edizione Integrale. Firenze, 1928.
- Marco/R/Einaudi: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ed.), I viaggi di Marco Polo. In Navigazioni e viaggi. vol.3, Venezia, 1559 (Giulio Einaudi (re. ed.), Torino, 1980.)

参考文献

- 榎本涉 2003 《关于陆仁与道元文信（「陸仁と道元文信をめぐって」）》《东亚海域与日中交流——19-14 世纪（『東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九～一四世紀』）东京：吉川弘文馆，2007，212-269 页（原载：《14 世纪后半来到日本的人们（「一四世紀後半、日本に渡来した人々」）》、《遥远的中世（『遙かなる中世』）》20，2003。）
- 榎本涉 2006 《早期日元贸易与人员交流（「初期日元貿易と人的交流」）》《宋代的长江流域——基于社会经济史的视角（『宋代の長江流域——社会経済史の観点から』）》东京：汲古书店，231-272 页。
- 榎本涉 2007(a) 《东亚海域与日中交流——19-14 世纪（『東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九～一四世紀』）》东京：吉川弘文馆。
- 榎本涉 2007(b) 《元朝的倭船对策与日元贸易（「元朝の倭船対策と日元貿易」）》《东亚海域与日中交流——19-14 世纪（『東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九～一四世紀』）》东京：吉川弘文馆，106-175 页。
- 榎本涉 2014 《宋元交替与日本（「宋元交替と日本」）》《岩波讲座 日本历史 第七卷 中世 2（『岩波講座 日本歴史 第七巻 中世 2』）》东京：岩波书店，77-112 页。
- 榎本涉 2015 《13 世纪的东亚局势与高丽、大越、日本（「13 世紀の東アジア情勢と高麗・大越・日本」）》《日越交流的历史、社会、文化的各课题（『日越交流における歴史、社会、文化の諸課題』）》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17-24 页。
- 深见纯生 2004 《元代的马六甲海峡——通道？据点？（「元代のマラッカ海峡——通路か拠点か」）》《东南亚——历史与文化（『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18，86-98 页。
- 深见纯生 2006 《单马令的发展与 13 世纪东南亚的商贸高潮（「ターンプラリンガの発展と 13 世紀東南アジアのコマーシャルブーム」）》《国际文化论集（『国際文化論集』）》34，81-97 页。
- 福島金治 1991 《关于镰仓极乐寺的唐船派遣（「鎌倉極楽寺の唐船派遣について」）》《地方史研究（『地方史研究』）》233。

- 福島金治 1996 《中世鎌倉律院と海上交易権——熱海船の特性と鎌倉大佛造営料唐船の派遣情况（「中世鎌倉律院と海上交易権——熱海船の性格と鎌倉大仏造営料唐船の派遣事情」）》《鎌倉大仏研究（『鎌倉大仏研究』）》1
- 石井正敏 2010 《关于文永八年三別抄牒状（「文永八年の三別抄牒状について」）》《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 史学（『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 史学』）》56, 1-34 頁。
- 石垣市总务部市史編集課 2008. 《石垣市史考古視覚版 5 从陶磁器看交流史（『石垣市史考古ビジュアル版 5 陶磁器から見た交流史』）》石垣市。
- 伊藤幸司 2009 《外交と禅僧——东亚交流圏中禅僧的作用（「外交と禅僧——東アジア通交圏における禅僧の役割」）》《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社会と文化』）》24, 41-70 頁。
- 伊藤幸司 2010 《跨越东亚的禅宗世界（「東アジアをまたぐ禅宗世界」）》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日本の対外関係 4 倭寇と「日本国王」（『日本の対外関係 4 倭寇と「日本国王」』）》東京：吉川弘文館。30-56 頁。
- 江静 2000 《元代赴日中国商船銳減原因初探》《中日文化論叢》1998。
- 江静 2002 《元代中日通商考略》《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1。
- 鹿児島県川辺郡知覧町教育委員会 2006. 《国家制定遺迹 知覧城（三）（『国指定遺迹 知覧城（三）』）》知覧町：鹿児島県川辺郡知覧町教育委員会。
- 川添昭二 1993 《鎌倉末期の対外関係と博多——新安沈没船木簡・東福寺・承天寺（「鎌倉末期の対外関係と博多——新安沈没船木簡東福寺承天寺」）》《鎌倉時代文化伝播の研究（『鎌倉時代文化伝播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 李康汉 2016 《高麗の蒙古冲击と反応（「高麗におけるモンゴルのインパクトとレスポンス」）》《国際研究会「亚欧大陆的蒙古冲击」文集（『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ユーラシアにおけるモンゴルのインパクト」予稿集』）》東京：昭和女子大学。
- 桃木至朗 2011 《中世大越国の成立と変容（『中世大越国家の成立と変容』）》吹田：大阪大学出版会。
- 森克己 1975 《日宋貿易研究（『日宋貿易の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
- 森平雅彦 2013 《蒙古覇権下の高麗——帝国制度と王國の対応（『モンゴル覇権下の高麗——帝国秩序と王國の対応』）》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 （文化公報部文化財管理局）（編）1981-85 『新安海底遺物（資料篇Ⅰ-Ⅲ）』：。
- （編）1988 『新安海底遺物（総合篇）』：。
- （文化財庁、国立海洋遺物展示館）（編）2006 『新安船 The Shinan wreck』1-3。：。
- 村井章介 1988(a) 《高麗三別抄叛乱と蒙古来襲前夜の日本（「高麗・三別抄の叛乱と蒙古来襲前夜の日本」）》《亞洲之中的中世日本（『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東京：校倉書房，1988, 144-188 頁。
- 村井章介 1988(b) 《蒙古来襲と鎮西探題の成立（「蒙古来襲と鎮西探題の成立」）》《亞洲之中的中世日本（『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東京：校倉書房，1988, 189-235 頁（根据原载《史学杂志（『史学雑誌』）》87/4, 1978 改编）
- 村井章介 2003 《日本交通と禅律文化（「日元交通と禅律文化」）》《日本中世の異文化接触（『日本中世の異文化接触』）》東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 171-213 頁（原载：《日本の時代史 10 南北朝動乱（『日本の時代史 10 南北朝の動乱』）》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
- 村井章介 2010 《蒙古来襲と異文化接触（「蒙古来襲と異文化接触」）》《日本中世の異文化接触（『日本中世の異文化接触』）》東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 375-400（原载：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日本の対外関係 4 倭寇と「日本国王」（『日本の対外関係 4 倭寇と「日本国王』）》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
- 村井章介 2013(a) 《再论寺社造営料唐船——貿易、文化交流と沉船（「寺社造営料唐船を見直す——貿易・文化交流・沈船」）》《日本中世の異文化接触（『日本中世の異文化接触』）》東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 241-272 頁。
- 村井章介 2013(b). 《从肖像画「贊」来看禅的中日交流（「肖像画・賛から見た禅の日の交流」）》《日本中世の異文化接触（『日本中世の異文化接触』）》東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 273-294 頁。
- 永井晋 2010 《从金泽文库古书看唐船派遣资料（「金沢文庫古文書に見る唐船派遣資料」）》《金泽文库研究（『金沢文庫研究』）》324。
- 中村翼 2010 《鎌倉幕府「唐船」相关法律法规的探讨——以“博多权门贸易”说的批判性继承为目的（「鎌倉幕府の「唐船」関係法令の検討——「博多における権門貿易」説の批判的継承のために」）》《鎌倉遺文研究（『鎌倉遺文研究』）》25。
- 中村翼 2013 《日元贸易期的海商と鎌倉、室町幕府——寺社造営料唐船の歴史的地位（「日元貿易期の海商と鎌倉・室町幕府——寺社造営料唐船の歴史的位置」）》『ヒストリア』241。
- 日本经济新闻社、东京国立博物館（編）2003. 《鎌倉——禅の源流（『鎌倉——禅の源流』）》東京：日本经济新闻社。
- Prawdin, Michael 1937. The Mongol Empire: Its Rise and Legacy. (tr.) Eden and Cedar Paul. Brunswick and London: Aldinetransaction.
- 龙野市埋藏文化財中心 2015. 《謎の八思巴字と光明山（『謎のバズバ文字と光明山』）》龙野市埋藏文化財中心。
- 佐口透 1970 《鞑靼和平（「タタールの平和」）》《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中世 3（『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中世 3』）》東京：岩波書店。
- 四日市市博 2001 《蒙古和平——東西交通の繁栄（「バクス・モンゴリカ——東西交通の繁栄」）》『しにか』140, 50-55 頁
- 四日市市博 2015(a) 《基于亚欧视角的伊利汗国公文書——兼作伊利汗国公文書研究序論（「ユーラシアの視点から見たイル＝ハン朝公文書——イル＝ハン朝公文書研究の序論として」）》『史苑』75/2, 257-300 頁。
- 四日市市博 2015(b) 《13-14 世纪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与贸易——以基于元朝视角的元朝与西洋航路南海诸国的关系为中心（「13～14 世紀における中国－東南アジアの通交と貿易——元朝から見た西洋航路上の南海諸国との関係を中心に」）》《昭和女子大学国際文化研究所紀要》21, 13-41 頁。
- Yokkaichi Yasuhiro 2015. (ed.) Special Issue: Multilingual Documents and Multiethnic Society in Mongol-Ruled Iran, in Orient 50.
- 四日市市博 2016 《14 世紀の日本と元朝海上貿易中的新安船（「14 世紀の日本と元朝の海上交易における新安船」）》『40
——
：
，164-184 頁。

能够搞清楚绘制委托人的意图以及画师的世界观等，一步步地去揭开作品上的层层面纱。当然，仅靠本篇报告是无法搞清所有的问题的，于是只能缩小了所设定的问题的范围。相信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找到一个线索，能够逆向推证“蒙古袭来”(蒙古战争)的真实情况，更希望在这一线索的基础之上深入研究，发展成为蒙古入侵表象论亦或是泛亚洲史图像学研究。

1. 解读《蒙古袭来绘词》的准备工作

(1) 绘卷的简单说明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蒙古袭来绘词。考虑到便于理解，本报告的题目使用了《蒙古袭来绘词》这一一般性称呼。由于这幅绘卷描绘的是主人公竹崎季长的事迹，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应当称之为《竹崎季长绘卷》，本人也基本同意后者的观点。但是在这里暂且保留这一观点，不做赘述。

现在保存在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中的这幅绘卷，分上下(前后)两卷。应该就是绘卷的主人公——竹崎季长委托画坊创作了这幅绘卷。绘卷从竹崎季长家中外流之后某个时间点开始归熊本大矢野家所有。1825年(文政8)，绘卷由熊本藩主细川家代为保管，后来被带到江户，渐渐被大多数武士所熟知(例如：松平定信的阅览和描摹→《乐翁本》的制作)。近代以后，全国临时宝藏调查委员会经过调查于1890年(明治23)从绘卷所有人大矢野家收购了这幅绘卷归入宫内厅收藏。现在，这幅绘卷虽属皇家御物，但实际上是长期保存在三之丸尚藏馆。

大矢野家族居住在熊本天草，在文禄·庆长时期加入肥后南部地区小西行长的麾下。西军小西家族在关原之战中灭亡之后，大矢野家族便又投奔了统领肥后一国的加藤家族(被赐予玉名郡下长田村的领地)。加藤家族被贬后，大矢野家族又成为细川家族的家臣，玉名郡则成为该家族的大本营。

作品的规格如下所示。前卷(上卷)宽40.3cm，长2450.6cm，后卷(下卷)宽40.2cm，长2111.8cm。关于顺序，学者意见各不相同，通常情况下按照现存状况划分为：词书一到九，绘画一到十为前卷，词书十到十六，绘画十一到二十一为后卷。这是一幅很长的绘卷，之前还曾被分成三卷。绘卷中有前后次序混乱、错页、删除等情况，画纸的质地和规格也不尽相同。另外，有一部分词书和绘画被分开保存(部分被藏匿在了大矢野家)，这一点后面还会详细分析，因此想要将绘卷复原到最初的模样是极其困难的。正因如此，相关的史料研究也非常多，有了深厚的积累。例如，有学者认为同样的作品同时绘制了两幅(原本·副本)，这一说法很受支持。但也有人说不不仅是两幅，甚至有可能是三幅。这些都需要今后继续深入研究。

(2) 研究本绘卷的视角和课题

研究这样的绘卷史料，不仅要研究作品的绘画部分、词书部分的各个细节，对卷末“奥书”(说明制作目的的文章)的理解也至关重要。前者是俯瞰全体、聚焦细节的视点和方法，而后者则是将整部作品当成一个对象来研究，是一个更为超视性的视点。绘卷研究就是通过两种研究的细致考察，在两种方法中来回、结合而最终获得升华，实现突破。但是，由于这部作品的错页、修改、添加等后来的加工较多，因此研究时我们应该先用后者的方法把握整体，在此基础上再来对前者在细节上的修改等进行解释。这一研究顺序有助于我们弄清楚绘卷是怎样发展成为现今这种状态的，有助于我们一步步地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有助于我们复原其本来面貌。

但另一方面，很多学者致力于通过细节分析推测绘卷原本模样，以期提高绘卷的“实证性”。最近，堀本一繁的研究就很受关注，他通过研究词二的错页，推断出了竹崎季长的行军路线。

这幅绘卷不合常理的地方就在于，卷末有两段相当于“奥书”的文章。（在此按顺序称之为“A（词十五）”“B（词十六）”）。虽然两处落款都是“永仁元年（1293）二月九日”，但两个“奥书”文风各不相同，所写的创作目的也大相径庭。

简而言之，A写的是“安达泰盛之事”，安达泰盛“放文书，赏骏马，唯赐季长一人”，武士竹崎季长（担任海东乡地头一职之际）在镰仓受到了安达泰盛的关照，A的内容则可称之为对安达泰盛的“镇魂”。

与此相对，B则描写竹崎季长拜谢其所信奉的甲佐神社（大明神），也就是对担任海东乡地头一职的感谢之意。具体说来就是甲佐的大明神现身降临到神社祭坛东边的樱花树上，这个“东”指的是“关东”，和竹崎季长后来所任“海东地头”一职的“东”也是同一个字，（虽然这种说法太过于牵强附会），于是竹崎季长下定决心去关东讨个说法并付诸行动，最后获得成功。

更有意思的是，“永仁元年二月九日”这个日期其实当时是不存在的，正确来说应该是“正应六年二月九日”（荻野三七彦）。年号改为“永仁”是在正应6年的8月5日，中世纪的日本不像中国和朝鲜那样有即位年（即位当年为零年）的概念，因此当年（1293年）8月5日之前是正应年间，8月5日之后年号则改为“永仁”。也就是说，“永仁元年二月九日”这个年号，在正应6年2月时，是当时的人们不可能知道的“未来年号”。反过来也就是说，这个日期是在年号改为“永仁”之后才写下来的。这就说明，这部作品问世是在文永·弘安之役的十多年之后，甚至有可能是永仁元年之后才创作的。绘卷的创作意图不是很清晰，所以让很多学者都不明就里。

绘卷卷末通常会附有“奥书”，记载有年月日。如果“蒙古袭来绘词”原本最早是正应6年制作而成的，那么日期就应该记载为“正应六年二月”。后人即便对其进行改写、改动，理应也会遵循原本的日期，由此可以推测本绘卷原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本）的原初形态应该是在永仁元年之后形成的。

此前有学者（宫次男）提出，应当将“奥书”A、B和绘卷本身分开进行理解，这一说法近年再次得到提倡（服部英雄）。服部的观点是（1）关于“奥书”A，竹崎季长后来可能是和安达泰盛一派断绝了关系，因此才没有参加岩门合战。（2）关于“奥书”B；绘卷里面出现了熊野先达（熊野神社的修道者·山野修行僧），而“奥书”中又出现阿苏神社系列的甲佐神社（大明神），这只能说明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另外根据服部的研究，肥后地区信奉熊野主要是在玉名地区，玉名周边有一个地方叫竹崎，正是季长之姓的来源），另外竹崎季长任海东乡地头一事在绘卷中也一次都没有提到，也就是说绘卷和“奥书”B根本就是互不对应的。

“奥书”A的一大特征就是汉字都有注音假名，从字体和字迹来看，它和疑点重重的词九（其内容和词二、词七都有很多重复）大体可以推断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宫次男·小松茂美·太田彩）。不过，“奥书”A描写了竹崎季长去安达泰盛处为自己鸣不平的场面，也强调了安达泰盛的恩情（但是词七和词九的笔迹也不一样）。这样一来，从现存绘卷的整体结构来看，服部英雄以“奥书”A来论证竹崎季长是反安达泰盛派的这一说法是前后矛盾的。

石井进认为词九有可能是误写（小松茂美也认为词九有可能是从别的书中误收进来的）就没有把词九收录到《中世政治社会思想（上卷）》一书中。因此，石井进把现在的“词十”编成了“词九”，这就和宫内厅现存绘卷的词书编号每个都相差一个号。也就是说“奥书”A（宫内厅现存本是词十五）在石井进的翻刻版本里面是词十四，“奥书”B（宫内厅现存本是词十六）则是词十五，这一点需要注意。

众所周知，竹崎季长受恩于三个人——安达泰盛、安达盛宗、小式（武藤）景资，这三个人后来都被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第九代执权北条贞时的第一家臣——平赖纲所算计，被一一剿灭（1285年（弘安8年），霜月

但真实情况到底怎样尚未解明，以上两种假说也都没有确实的根据。

(1) “奥书” A 和词七·词二·图二——大矢野家族的起源论

词二中描绘了“当日大将（当天的指挥官）”——小式景资。绘词的主人公竹崎季长骑马行进走过景资面前，告诉他说，倘若自己率先攻入敌阵，让景资务必向镰仓将军报告。（景资答应了这一请求）。与这词书相对应的绘画就是下图二。画面右侧端坐着的正是小式景资，和词书二对照一下就会很清楚，现今未能留存下来的绘画前半部分画的应该就是竹崎季长（只可惜所有的摹本也都没有前半部分）。



看上图就能很容易推测，很有可能是为了掩饰竹崎季长的无礼举动，才故意把图二的前半部分给删除了。若非如此，没有理由要把描写了竹崎季长无礼举动的词二藏匿起来。在江户时期，武士阶层的秩序和礼制都非常严格，把描绘有武士无礼举动的绘卷当成宝贝收藏一事是会遭到谴责的。

33

为忤逆者埋下了伏笔。后来，源赖朝以“企图策划东国独立”的罪名肃清了广常（河内祥辅）。另外，关于中日两国律令制度上关于下马礼的继承关系，大隅清阳有很详细的研究。

这样推论是因为词二的内容和词七·词九的内容大部分都是重合的，（竹崎季长仅率五匹战马，在“当日大将”小式景资面前表达了自己想要率先冲锋陷阵的决心）但是，后面的词七·词九却完全没有提及竹崎季长未行下马礼一事。

为了证明这一推论，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下词书内容的比重。词二并没有遗缺前半部分，一开始就是描写竹崎季长在博多战场向“当日大将”小式景资表达自己想要冲锋陷阵的愿望。也就是说，词二描写的是战争现场以及当时人们的谈话记录。

与此相对，词七·词九开头描写的是1275年（建治元年），竹崎季长来到镰仓因想要论功行赏在安达泰盛面前申诉时所说的话。回忆往事，将当时在“当日大将”面前表的决心等等又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但是，在这篇诉文里面也没有提到季长在小式景资面前没有行下马礼一事。如前所述，即便是为了冲锋陷阵，作为一名武士，不行下马礼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行为。

书写词九（和“奥书”A字迹相同）的第43页用纸的最右侧可以隐隐约约看到画有松枝，因此可以推测出这前面没有缺失部分，另外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画师跨过纸缝绘制了这幅图（大仓隆二·佐藤铁太郎）。但是很遗憾，词九后面有缺失，无从推测全文。但是，通过“奥书”A和词九可以推断，当时至少绘制了两部《蒙古袭来绘词》（包含“奥书”A和词九的这一部便是异本之一）。

这样看来，词二以及与之对应的图二之所以会被大矢野藏匿在家中并不难理解。小式景资下令要在博多息兵“一同（同时·一齐）作战”，但竹崎季长因自己手下太少急于通过打头阵的方式立军功。（词二·词七·词九）大矢野家需要对故事情节进行如下修改：“勇敢”的竹崎季长不惜扰乱行军秩序一心想要冲锋陷阵，但他并不是一个会对自己的上司采取无礼行为的粗鲁之人。也正因如此，大矢野家才会对绘卷进行藏匿，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删除。

再回到“奥书”A的问题，即向安达泰盛表示感谢这一问题。词九隐藏了竹崎季长没有向小式景资行下马礼这一事，而“奥书”A与词九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也就是说，大矢野家族一直想把竹崎季长和安达泰盛、小式景资定位于同一条线上，因为这会给大矢野家的祖上增光添彩。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大矢野家一直认为自家祖上是大宰大监，相当于担任大宰小式的武藤家的直属部下。可以说，近世以后大矢野家族一直在强调（润色·捏造）自家和小式家族（武藤家）的亲密关系。小式景资有恩于竹崎季长，大矢野家族自然而然就把竹崎季长当做了媒介加以利用。

第二：现存绘卷中描绘了大矢野种保三兄弟在1281年第二次战役（弘安之役）的海战中和竹崎季长并肩作战的画面（后卷·图十六——“大矢野兄弟三人/种保”这一说明文字很明显是后来加上去的），这是为了强调竹崎季长和大矢野家族的先祖在战场上有过出生入死的交情。不仅如此，后卷弘安之役中还描绘了竹崎季长和安达盛宗（泰盛次男，肥后守护代）军队的密切关系。

那么，大矢野家族为什么不想向小式景资靠拢呢？小式景资继承了家业，在岩门合战中又取得了胜利。关于这一点前人研究已经指出：岩门合战之后，筑后·丰前·肥前·肥后等地被北条得宗家一一收入囊中，小式景资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坐收渔翁之利；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平禅门之乱（1293年（正应6年=永仁元年））后的第二年，原安达泰盛派重新夺回了权力，另外，江户时期的主流历史观是源平政权更迭进入源氏天下，因此反抗过平氏=北条家的菊池家族、大友家族、小式家族等就如同英雄一般，对大矢野家族来说，一段能和这些英雄攀上关系的家族“历史”非常重要，自然就会非常重视描写了自家和小式家族、菊池家族亲密关系的《竹崎季长绘卷》了。

“Sartaqčīn ayan”。¹

撒里答是个很常见的蒙古人名。尤以征服花剌子模的术赤家族以此为名的人就有数例。拔都的长子名叫撒里答。² 贵由汗死后，撒里答奉父命率军拥宪宗蒙哥即位。后镇守钦察汗国西境，兼统斡罗思诸国。法国圣方济各会鲁不鲁克·威廉（William of Rubruk）当时东行至蒙古，多次见到拔都之子撒里答。³

术赤汗的第一个儿子斡儿答的长子也叫撒儿塔黑台。⁴ 窝阔台汗时期，第一次东征高丽的蒙古军统帅名叫撒礼塔。1231年，撒礼塔受命征高丽，连陷城邑，高丽王遣使请和。他在高丽境内置京、府、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⁵ 次年七月，高丽王逃之江华岛，杀死蒙古所置达鲁花赤。八月，率军攻高丽。五年，撒礼塔受命再征高丽，至王京（今朝鲜开城）南，攻处仁城，被高丽军射杀。⁶

忽必烈汗手下还有一名大臣叫作撒儿塔黑台那颜。⁷ 拉施特说，阿难达的“异密之中，有一个撒儿塔黑（Sartaq），是一个反对伊斯兰教的人，他前往合罕处抱怨说，阿难达经常都在于教堂中，从事于祈祷和念诵《古兰经》。”⁸

二、肃良合（Solangqa）

肃良合是蒙古人对高丽的称呼。肃良合作为蒙古人对高丽的称谓，最早以汉字音译“莎郎合思”（Solangqas，原词的复数形式）见于《元朝秘史》第274节，旁译为“高丽”。⁹ 元朝后期，高丽人奇氏完者忽都是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皇后。后至元六年（1340）为妥欢贴睦尔生下皇子爱猷识理达腊。这样，蒙古皇室中也有了高丽人血统。母以子为贵，奇氏被立为第二皇后。至正十三年（1353），爱猷识理达腊立为皇太子。二十五年（1365），奇氏立为皇后，由摄太尉持节授以玉册、玉宝。册文中说：“咨尔肃良合氏，笃生名族，来事朕躬。”在立奇氏为皇后的诏书中说：“改奇氏为肃良哈氏”。¹⁰ 妥欢贴睦尔的诏书，将奇氏这个类似汉人的姓改用蒙古语，成为称呼全体高丽人的族名，认为这是“名族”，而且规定了 Solangqa 的标准汉译用字。此外，《元史》中出现使用以钦定族属肃良哈为姓氏的人有朴赛

¹ 亦邻真：《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93页。

² 余大钧、周建奇译，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二卷，1985年，第127页；波义耳英译，周良宵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9页。

³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耿昇 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第313-317页。

⁴ 余大钧、周建奇译，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二卷，第116页。

⁵ 《元史》卷二百八，高丽传，第4608页。

⁶ 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十三，高宗世家二。

⁷ 余大钧、周建奇译，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二卷 第318页。

⁸ 余大钧、周建奇译，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二卷 第380页。

⁹ 《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第337页，周清澍写的“肃良合”条。

¹⁰ 《元史》卷一百一十四，完者忽都皇后奇氏传；卷46 顺帝本纪，第971页。

国，受封为左手兀鲁兀四千户之长，成吉思汗赐克烈部王汗之弟札阿绀孛之女亦巴合别乞为其妻。¹

五、南家台

南家台（南家思），南家，金朝人对宋人的称谓。蒙古沿用此名，并加复数语尾-S。称为南家思。² 成吉思汗时期的开国功臣启昔礼之孙，成宗朝大臣哈拉哈孙之父名叫囊加台。囊加台“从宪宗伐蜀，卒于军。”³ 乃蛮部人囊加歹，初任都元帅府经历，从都元帅阿术围宋襄阳，又从伯颜、阿术渡江东下，屡奉命使宋谈判。元军逼临安（今杭州），入城受宋降表。取浙东诸州县，迁蒙古军副都万户，后擢江东道宣慰使。⁴ 伯颜的一个儿子的名叫囊加歹。⁵

六、钦察 (Kipcak)

钦察人，原居住在额尔齐斯河流域。“钦察”（Kıpçak）一名，源于中世纪伊朗语，Kip，意为“红色”或“浅色”；cak，是对所有草原居民的统称。所以，钦察，意即“浅肤色的草原居民”。钦察人还曾被称作“库曼人”，该名来自于位于高加索的库曼河。他们是一个伊朗-突厥混合民族。七世纪的时候，钦察人被突厥人所逐，向西迁徙。十一世纪中期，钦察人定居于伏尔加河流域和乌克兰草原地带。⁶ 据《元朝秘史》的记载，1205年，成吉思汗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打败了蔑儿乞部落的残余势力，其领袖脱黑脱阿别乞被杀，其忽都等三个儿子经过康里，逃到了钦察。1216年，成吉思汗又命速不台远征康邻、乞卜察兀惕（钦察）、斡罗速惕（俄罗斯）、马札刺惕（匈牙利）、阿速惕等十一国。⁷ 窝阔台时期由拔都统帅的兵锋直抵多瑙河的侵略战争，《元朝秘史》称之为 Qibcaqcin ayan。⁸ 后来，拔都建都于撒莱，以钦察草原为领地，有钦察汗国之称。钦察人多被蒙古俘虏为奴，因制黑马奶酒，故名哈刺赤。元世祖时，首领土土哈有战功，钦察人隶诸王为奴者免为军，置钦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后又

¹ 《元朝秘史》第208节。

² 伯希和：《南家》，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57页；《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页353，周清澍写的“南家”条。

³ 《元史》卷一百三十六，哈拉哈孙传，第3291。

⁴ 《元史》卷一百三十一，囊加台传，3184

⁵ 《元史》卷一百二十七，颜传，第3116页；冯承钧：《元代的几个南家台》，《冯承钧西北史地论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第185-201页。

⁶ 乌云毕力格：《喀喇沁万户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15页。

⁷ 《元朝秘史》第199节、第262节。

⁸ 亦邻直前揭文,《亦邻直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93页。

的关注。

所谓全景画馆，就是让全景画面覆盖圆柱形建筑物的整个内墙面，供观众环顾欣赏的场馆。全景画馆起源于 1794 年的伦敦，而后传到欧洲和美国，矢田一啸在旅欧、旅美期间大概也参观过。明治 23 年（1890），日本第一家全景画馆在上野开业，随后在浅草、大阪、京都、熊本、富山等地也陆续建成。

九州的第一家全景画馆开在了熊本，矢田一啸在那里创作了西南战争的全景画。明治 27 年（1894）他来到福冈后，支持在博多建造元寇纪念碑的运动，为此，以元寇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的全景画。为了能够向世人展示矢田一啸的这些作品，人们在建有元寇纪念碑的东公园里也修建了一个元寇纪念全景画馆。³此外，矢田一啸还运用自己掌握的解剖学的知识，改良了博多人偶的制作工艺。后于大正 2 年（1913）逝世。⁴

图 1 矢田一啸 蒙古袭来图 “博多登陆” 本佛寺



图片源自 浮羽市官方网页>生活>历史・传统文化>本佛寺藏“元寇油画”

http://www.city.ukiha.fukuoka.jp/imgkiji/pub/detail.aspx?c_id=71&id=22 浏览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

³是由佐野前励人（下文中提及）修建的，位于铜像前面的广场。大正中期，毁于一场暴风雨。太田弘毅编著《回顾元寇战争—纪念碑建设史料—》（『元寇役の回顧—記念碑建設史料—』錦正社，2009，p. 164。

⁴以上参考太田 2009 和西本匡伸等编著的《重生的明治绘画—修复后的矢田一啸《蒙古袭来绘图》》（『よみがえる明治絵画—修復された矢田一啸「蒙古襲来絵図」—』福岡県立博物館，2005）。

图2 「蒙古袭来绘词」前卷，图之七 宫内厅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C5%8Dko_Sh%C5%ABrai_Ekotoba.jpg?uselang=ja 浏览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

元军形象的变化——明治·现代日本与中国

从矢田一啸创作的这幅全景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元军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对于火药武器的运用（图8），著名的《蒙古袭来绘词》（文末附图2）中描绘了日本人与登陆博多的元军战斗的画面，矢田一啸在此基础上发挥想象力，从而使得图画的结构更加有立体感。前面提到的汤地丈雄、高桥熊太郎所著的《元寇》里的插图也使用了《蒙古袭来绘词》中“铁炮”爆炸的场景⁵，下面这段文字更可以看出对火药武器尤为关注。

元军已占领中亚地区，将士身经百战、骁勇无比，秩序井然、驰骋千里，且进退自如，战法令人出其不意。特别是射毒箭、放火箭、打铁炮，其声音响彻云霄，如雷贯耳，被击之人不管如何刚勇，也会瞬间殒命。⁶

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描绘元军的画像、影像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元军所使用的先进的火药武器的描绘。特别是近些年来，有的作品中描绘的元军所使用的武器，其实尚未被完全证实当时已经存在。比如，在漫画家高木七彦的《Angolmois 元寇合战记》中就出现了一种金属管型火器（图3-a）⁷，但忽必烈时代这种火器是否存在尚未得到证实。高木七彦作品的一大特点就是在缜密调查的基础之上独创新颖的内容。比如说，在他的作品里，唐朝是鲜卑系王朝，唐朝皇帝是作为“天可汗”君临天下的（图3-b）。⁸同时，他在作品

⁵汤地·高桥，1893，p. 69.

⁶汤地·高桥，1893，p. 64.

⁷高木七彦《Angolmois 元寇合战记》第（『アンゴルモア 元寇合戦記』第4卷，角川书店，2015，pp. 37-38）

⁸同上，第5卷，2016，p. 106. 关于唐朝=“鲜卑系王朝”之说、唐太宗的“天可汗”称号等，参

图 3-e 蒙古将军 (同卷 3, p. 171)



図 3-f 蒙古将军 (同巻 3, p. 172)



图 4-a 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旅游区 2016 年 2 月 23 日发表人拍摄



图 4-b 同 全景图



图 4-c 同 CG 影像



图5 古阿拉伯语文献插图中所描绘的蒙古军队投石机 阿伯丁大学图书馆藏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MongolsBesiegingACityInTheMiddleEast13thCentury.jpg>

浏览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

蒙古帝国疆域横跨欧亚大陆，曾经是人类历史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帝国，其最大的武器便是游牧民族所特有的组织力和机动力。但是在征服中亚花刺子模王朝，进攻巴格达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进攻的是壁垒森严的城池，于是在此过程当中开始引进各种各样的武器，在远征中国南方的时候，还新建了水军¹¹。现今已知的是蒙古帝国在进攻中国南方及花刺子模等地的过程中吸收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技术（以及技工团体）¹²，包括军事技术。关于蒙古帝国是如何使用火药武器的，至今还有很多未解开的谜团，本文将从文献学及考古学的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思考现今我们应当怎样去评价。

蒙古帝国在征服欧亚的战争中积极引进新的军事技术，例如在攻城时运用在伊朗改造

¹¹ 萧启庆《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汉学研究》第8卷第2期(16号)，1990，177-200；向正树「蒲寿庚军事集团和蒙古海上势力的抬头」（「蒲寿庚軍事集團とモンゴル海上勢力の台頭」『東洋学』89(3)，2007，pp. 80-82）。

¹² 松田孝一「蒙古帝国确保工匠和管理的诸相」《平成12~13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B)(1)从研究成果报告书碑刻等史料的地域分析蒙古帝国・元朝政治・经济系统的基础研究》（「モンゴル帝国における工匠の確保と管理の諸相」『平成12~13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礎研究(B)(1)研究成果報告書碑刻等史料の総合的分析によるモンゴル帝国・元朝の政治・経済システムの基礎的研究』(研究代表者：松田孝一；課題番号：12410096)，2002，pp. 171-200）。

3. 两种火药武器和“炮”的两难选择

虽然在中国早已开始使用火药武器并加以不断改良，但蒙古帝国（元朝）时期将其大规模运用在战场上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关于这一时期火药武器的使用，相关记录在汉文文献中想必非常丰富。但是火药武器究竟是什么形状的，却依然难以推断。被认定是这一时期的火药武器文物中有下述两种类型：陶制炮弹和金属管状射击火器。但这两种武器又有几种搭配组合，汉语中哪些词是指这些武器（或组合）的，尚不清楚，这些都给研究造成了困难。

在汉语中自古以来使用“砲”（后为“炮”）这个字来形容火药武器。“砲”，原写做“礮”，指的是投射巨石的机械。火药武器出现之前，《后汉书》袁绍传中出现过这个字。石字旁表示意思，旁边的“包”表示发音（也有人认为是表示轰隆声），从金代到元代，可能都是用这个字来代指火药武器。从博多湾和伊万里湾里面发掘出的火药武器“てつはう（铁炮）”的汉语表记可能也就是这个“砲”字。不过同一时期的投石机（前文提及）又被称为“回回炮”。所以，不同的“炮”到底是指哪种炮，我们很难马上搞清楚。但是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再加上仔细分析文献中的用例，应该还是能够有所发现的，接下来我就想做几个假设性的考证。

a、陶制炮弹

所谓“てつはう（铁炮）”，是指将火药填充于直径 15 厘米的球型的陶制容器中用来引爆的装置。1281 年，蒙古军远征日本，四千艘蒙古军舰沉没于长崎县松浦市鹰岛海域。后来这片海域的海底中发掘出大量的甲冑、箭束，还有“铁炮”。由于海底发掘的文物外部被贝壳所覆盖，很难判断其原来的形状，另外金属文物的铁锈还会和贝壳紧紧地粘合在一起，为了探明其原来的形状，需要使用具有高速、大功率摄影功能，可以实现 3D 立体成像的 X 光 CT 扫描仪。在鹰岛海域发现的“铁炮”里面还有残留的物质，对其进行 X 光 CT 扫描后发现，内部残留的是短条状的铁片和陶器碎片。铁片上有气泡，可以推断当时使用的是铸铁。随着火药的爆炸，铁片和陶片一齐炸裂喷出，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在炮口附近发现留有纤维质的痕迹，可以推测这是导火线或者是其他有机物的内盖¹⁸。

忽必烈时代，不仅远征日本时使用了“铁炮”，其他关于元军灵活运用火器的记录也不

¹⁸ 今津節生「4. 长崎县松浦市鹰岛海底遗迹出土品の X 光 CT 調査」《蒙古来袭，元朝军船的启示》（「4. 長崎県松浦市鷹島海底遺跡出土品の X 線 CT 調査」『蒙古襲来，元の軍船からみえてくるもの』（鷹島神崎遺跡国史跡指定記念シンポジウム要旨集），2013，pp. 287-300）。

展示于各个博物馆。此前，内蒙古蒙元文化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全长 34.7 厘米、口径十厘米的铜火铳（上图 7）²³，铳身上所刻的八思巴字铭文“大德 2 年”（1298）经专家考证属实。这样一来，它就取代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元代至顺 3 年（1332 年）的铜火铳成为现存最古老的火器。

这件铜火铳是在大元上都遗址附近的牧民家中发现的，可能曾经是守卫上都的部队的武器。忽必烈政权末期，成吉思汗幼弟后裔乃颜、哈丹发起的叛乱大大动摇了帝国统治秩序，大德 2 年这一年是平定叛乱后的第六年，大元仍然没有放松对蒙古东部地区的警惕，有可能曾在此地部署火器部队以防万一。

c、在船上使用的火药武器

1984 年，在中国山东省登州港蓬莱古城出土了三艘古船。其中一艘残余船体长 28.6 米、宽 5.6 米，据考证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一艘长 32.2 米、宽 6 米的中等规模战船。随古船一起出土的还有石弹，“铜炮”，“铁炮”等²⁴。如果说海战中使用了火铳的话，那么这就说明那时的中国就已经有了装备有火器的战船，这实在是令人震惊。

结语

本文以火药武器为中心，分析了蒙古帝国形象在日本的变化，又从军事技术这一视点梳理了蒙古时代的亚欧交流。关于蒙古帝国如何使用火药武器，有必要从技术史上进行考证，但本文关注的是，在对明治时期和现代日本的元寇形象进行对比时，火药武器是一个关键点。

汤地丈雄在《元寇》一书的结论中指出，中亚地区的土耳其斯坦等国家屈服在成吉思汗的铁骑下，并不是因为缺乏忠臣义士，而是因为他们的爱国之心不够。“我大日本帝国的人民”不光有北条时宗的英明决断和将士们的勇气胆识，更是因为有拳拳“爱国之心”，我们才能挫败强敌，向海外扬我大日本帝国之国威，向世界展示我日本男儿之英雄豪气。²⁵另外汤地丈雄为矢田一啸的元寇大油画的画集作了序，在序言中这样描述日清战争（译者注：中日甲午战争）后明治 30 年（1897）的形势：“天下形势乃东洋危机日益加剧之秋”，“如今虽然表面和平亲善，但战后的戒备又甚于以往”²⁶。这样的描述充分反映了明治时期日本所处的状况，日俄战争爆发前夕，日本要一边对抗欧美列强一边制定国家的发展战

²³ 钟少异，齐木德·道尔吉，硯鸿，王兆春，杨泓《内蒙古新发现元代铜火枪及其意义》『文物』2004 年 11 月（总第 582 号），pp. 65-67+3plates.

²⁴ 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p. 210；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蓬莱古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彩图 20，41，图版 4.

²⁵ 太田，2009，p. 106.

²⁶ 太田，2009，p. 128.

【论文 6】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 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

孙卫国（南开大学）

至元十一年（1274）和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两次派大军征讨日本，乃近世东亚史上一件大事，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作为元朝藩国，高丽王朝是东征日本的重要参与者。高丽王朝被迫为东征建造战舰、准备物资；同时，高丽军队也随元军征讨。检视朝鲜王朝官修郑麟趾《高丽史》中，对这件历史事件是如何书写的，既是考察高丽王朝在这次征讨中地位的重要史料，也是检讨朝鲜王朝对这场战争认识的重要依据。《高丽史》有关这场战争的历史叙述，散见于《元宗世家》、《忠烈王世家》、《兵志》、《金方庆传》等相关篇章中。尽管零散，仔细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场战争，且透过分析战争中高丽如何巧妙地与元朝周旋，具体而微地解剖元丽宗藩关系的特质。

一.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的意图与历程

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丽幼主，自立为王。为了尽快树立王朝的正统性，一方面，李成桂当即遣使明朝，以“权知国事”的名义，派韩尚质以“和宁”、“朝鲜”请国号于明朝，积极谋求建立以明朝为宗主国的宗藩关系。明太祖朱元璋乃赐其国号为“朝鲜”，李成桂君臣欣然接受，通过箕子朝鲜接受周武王册封的传统，来争取明朝天子的册封，为其王朝获取宗主国的认同，以确立其正统性。^①同时，立国之初，李成桂就把编修高丽王朝史作为第一要务，试图从本国历史中寻找新朝的合法性。诚如有韩国学者指出：“通过对高丽时期的整理，指出高丽王朝存在的问题，以此不仅可以体现为克服这些问题而建国的朝鲜的正当性，还可以确定新统治理念的方向。”^②就在这种政治诉求下，朝鲜王朝开展了高丽史编纂。

最初以编年体为主，展开编修事宜。太祖四年（1395），李成桂令郑道传等人以高丽实录等史料为据，纂成编年体《高丽国史》，全书37卷。此书现已失传，有论之曰：“采摭各朝实录，及检校侍中文仁公闵渍《纲目》、侍中文忠公李齐贤《史略》、侍中文靖公李穡《金

^① 陈尚胜：《论朝鲜王朝对明朝的事大观》，《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24页。

^② （韩）朴仁镐：《韩国史学史》，全莹、金锦子、郑京日译，香港亚洲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二、《高丽史·世家》对元东征日本战争之书写原则与史实选择

元东征日本之前，忽必烈派使臣前往日本，希望建立一种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相当长。从一开始，高丽王朝几乎被迫成为元朝东征的马前卒。对于这个过程，《高丽史》尽力记述，字里行间，饱含着一种无奈又不甘的意识，显示高丽王朝在元朝高压下，试图寻求一种独立，以捍卫本国利益。以高丽王朝为中心，凸显其本国意识与本国立场，成为《高丽史》书写的最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战争准备阶段，面对元朝无端要求，高丽被动应付，全面地予以叙述。

元宗七年（1266），在征讨日本之前，忽必烈派遣使臣，途经高丽，出使日本。因为高丽人赵彝告密，忽必烈知悉高丽与日本常通往来，于是派遣使臣黑的、殷弘前来，并带来诏书，令高丽必须派使臣陪同前往，威胁说若不听令，即其忠诚可疑。高丽无法，只得命枢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赞等与黑的等往日本。但这次使行并未到达日本，元宗八年（1267）正月，宋君斐、金赞与蒙古使节至巨济松边浦，畏“风涛之险，遂还”。元宗只得令宋君斐随黑的去元朝复命，并上奏皇帝。奏疏中表达着几层意思：第一，先对此次使行未能如期抵达日本，加以解释。认为风涛骇浪，极度危险，担心使臣安全；加上日本人“顽犷无礼义”，对于蒙古使臣的安全，难以保证，故而只能半途而废。第二，对于蒙古听信赵彝之言，以为高丽常与日本通好，予以辨白。特别强调“日本素与小邦未尝通好”，只是偶尔与对马岛人稍有贸易，对于其他日本人，则根本没有往来，故而赵彝之言不确。第三，自从元世祖即位以来，高丽就深受隆恩，并铭记于心，“圣恩天大，誓欲报効，如有可为之势，而不尽心力有如天日。”^①只期望能报之于万一。这是一篇表决心的奏疏，也是一篇为高丽开脱罪责自我辩白的奏疏，充满了外交辞令。蒙古第一次派通使日本，就这样落空了。可见，高丽当时对于此事，实在没兴趣，只是应付而已。

蒙古对高丽这种刻意推脱，非常清楚。八月初一，黑的、殷弘及宋君斐等再次来到高丽，并携来忽必烈的问罪谕旨。忽必烈在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高丽的推脱诡计，严词指责高丽敷衍塞责，不诚实，“天命难谏，人道贵诚，卿先后食言多矣，宜自省焉”，对高丽给予严重警告。进一步强烈表达他通使日本的决心，“以必得要领为期”，一定要有结果，否则不会善罢甘休。最后追问高丽“誓欲报効”的说法，^②明确点出当时正是报效之时！软硬兼施，高丽毫无办法，只得硬着头皮派使臣前往日本，充当东征日本的马前卒。

过了十数天，高丽国王元宗遣起居舍人潘阜赉元国书及高丽国王书去日本。元国书有曰：“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迹，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③忽必烈向日本表达一种通使往来的愿望，希望日本能够上表通好，“以相亲睦”。若置之不理，就要兴兵问候，以示威胁。同时，高丽亦给日本奉上国书，现身说法，将其对蒙古的看法，向日本表露，规劝日本向元帝国遣使称臣。可见，尽管元跟日本并没有往来，之前了解也不多，但忽必烈通过高丽国王，向日本传达通使往来的愿望，希望两国互通往来，以建立一种友好关系。高丽王国尽管并不大愿意充当媒介，但在蒙古帝国的高压之下，也没办法，只能将蒙古帝国忽必烈帝诏书送达日本，同时附上高丽国书，表达通使愿望。蒙古对日本派遣使节，传达善意，但日本并不予理睬。随后忽必烈又遣使节赵良弼，亲自前往。

可见，《高丽史》在《元宗世家》中，对于高丽在蒙古的威吓下，被迫遣使前往日本的史实，一一陈述出来。在史实陈述的背后，有种无奈与被动的感觉。字里行间，显示出蒙古

^① 郑麟趾：《高丽史》卷26《元宗世家二》，元宗八年正月癸丑。台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

^② 《高丽史》卷26《元宗世家二》，元宗八年八月丙辰。

^③ 《高丽史》卷26《元宗世家二》，元宗八年八月丁丑。

四年（1273）四月，先后攻占了三别抄所占领的朝鲜半岛东南沿海诸岛，珍岛、耽罗先后平定，扫清了障碍，为征讨日本作准备。对于征讨经过，《忠烈王世家》予以简略的叙述。

有鉴于第一次征讨日本前，高丽只是被动应对元朝的需索，在第二次征讨前，高丽国王主动出击，试图参与其决策过程，尽可能限制蒙古将领权限及其对高丽的侵扰。第二次征讨日本决策之际，高丽忠烈王正在大都，亲受谕旨。《高丽史》在叙述决策过程中，如斯写道：

王以七事请：一以我军镇戍耽罗者，补东征之师；二减丽汉军，使阁里帖木儿益发蒙军以进；三勿加洪茶丘职任，待其成功赏之，且令阁里帖木儿与臣管征东省事；四小国军官皆赐牌面；五汉地滨海之人并充梢工水手；六遣按察使廉问百姓疾苦；七臣躬至合浦阅送军马。^①可见，高丽国王对参与东征之事，非常重视，他先让大臣上奏，要入朝亲受东征之旨，

不想由其他朝臣传旨，以争取主动。对于排兵布局，忠烈王提出他的七点见解，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这是高丽国王变被动为主动的一种努力。从他所提出的七点建议看，一方面希望少用汉军和高丽军，多用蒙古军队，甚至于水手都希望多用汉地之人，不要专门依靠高丽水手，以减少高丽王朝的责任；二则削弱洪茶丘的权限，别加其职位，因为洪茶丘是其死敌。与此同时，忠烈王希望由阁里帖木儿与他共同掌管征东事项。忠烈王这么做，意图十分明显，就是不希望在这过程中，受制于人，更不希望因为这次出征，让政敌再次掌权而影响高丽国政，所以他要争取主动。《高丽史》也着重对此叙述。尽管忽必烈并未采纳忠烈王之建议，但还是重视他的建议。九月丙辰，征东元帅府镇抚也速达赉二关字来，专为约束蒙古征东军队的：“其一……据本国见管粮储船只梢工水手，一切军须，请照验行下合属，如法准备，听候区用，勿值临时失误。其一，经行去处，窃恐不畏公法之人，放火烧草，事系利害，请照验行下合属，出榜禁约，如违，罪有所归。”^②这两条约束，可以说是对忠烈王所提七条建议的回应，免得征东将领胡作非为，伤害高丽。尽管在《高丽史》中，对蒙古东征军之危害，没有详述，但从忠烈王在第二次东征之前的积极努力，可以看出，为了避免东征军的危害，忠烈王争取积极主动，终于获得回报。

可见，《高丽史》对在战争准备阶段，高丽王朝如何从被动应对，巧妙周旋，极陈困难，到第二次征讨前，高丽国王主动出击，争取主动，给予了系统书写。从中体现高丽王朝对于宗主国元朝的敷衍与抗争，从而凸显高丽王朝争取独立自主的意识。

第二，战争前后，高丽所耗费的人工、粮食、马料，给高丽带来诸多困难，《高丽史》则予以详述。

诚如前面提到，高丽对元朝各种需索，采取敷衍应对的办法，《高丽史》试图写出高丽的无奈。而对于高丽所耗费各种物资，面临的各种困难，为元征日本所造船舰，耗费人工、粮食、马料，不厌其详地加以叙述，充分显示高丽为元征日本，所付出的代价。即如：“（元宗）十五年春正月，元遣总管察忽监造战舰三百艘，其工匠役徒一切对象，全委本国应副……兴役催督甚严……于交州道各为部夫，使征集工匠役徒三万五百余名，起赴造船所。是时，驿骑络绎，庶务烦剧，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③元宗十五年（1274）二月甲子，高丽国王就派遣别将李仁前往元朝汇报准备情况，将他们所做事情，所耗粮饷，事无巨细，一一上奏，特别表明高丽所面临的困难，百姓因之更加穷困，最后恳求“岁令供给，罔有期限，将无奈何！兹实悯焉！乞皆蠲免，以惠远人”^④，只求减免，以苏民力，以解民困。

高丽常常跟元朝算经济账，对于他们所提供的粮草数目，时时向元朝禀报，一笔一笔地算清。忠烈王三年（1277），高丽遣使上书书中省，其中有言：“小邦自至元七年以来，征讨

^① 《高丽史》卷29《忠烈王世家二》，元宗六年八月辛卯。

^② 《高丽史》卷29《忠烈王世家二》，忠烈王六年九月丙辰。

^③ 《高丽史》卷27《元宗世家三》，元宗十五年正月。

^④ 《高丽史》卷27《元宗世家三》，元宗十五年二月甲子。

经过,《高丽史·忠烈王世家》也只有寥寥数行字,其曰:

七年五月戊戌,忻都、茶丘及金方庆、朴球、金周鼎等以舟师征日本。癸亥,行省总把报:是月二十六日,诸军向一歧岛,忽鲁勿塔船军一百十三人、梢手三十六人,遭风失其所之。遣郎将柳底告于元。六月壬申,金方庆等与日本战,斩首三百余级;翼日复战,茶丘军败绩,范文虎亦以战舰三千五百艘、蛮军十余万来会,值大风,蛮军皆溺死。八月己卯,别将金洪柱自合浦至行宫,告东征军败,元帅等还至合浦。是月,忻都、茶丘、范文虎等还,元官军不返者,无虑十万有几。十一月壬午,各道按廉使启:东征军九千九百六十名、梢工水手一万七千二十九名,其生还者一万九千三百九十七名。^①

综合这两段史料,可知几点:

第一,叙述相当简略,充分说明《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对于这次征讨日本的战争,并不重视;或者说,叙述战争经过,并非其关注的重点历史事件。

第二,在如此简单的叙述中,其内容选择值得关注,重点介绍高丽军队的将领以及建制情况。首次东征,高丽军队尽管只有八千人,但是分左、中、右三路,各有将领指挥,对于元军将领,一笔带过。尽管从人数上看,高丽军队是绝对的少数,但在《高丽史》的叙述中,却是主要关注的对象。第二次东征的叙述,依然是以高丽将领优先,既点出了随军征讨高丽将领的名字,书中所记录唯一一场胜仗,还是高丽将领金方庆所指挥的高丽军队,斩首三百级。对于元军战事情况,未提一场胜仗,只述其败仗。在所提及的军队中,以“蛮军”称范文虎所率领的蒙古军队,表达一种蔑视情绪。

第三,具体战事情况,叙述极其简略,两次战败,都提及了“大风”。首次东征,“至一歧岛,击杀千余级,分道以进,倭却走,伏尸如麻,及暮乃解。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征日本,先胜后败,夜晚败于“大风雨”,也就是日本所谓的“神风”。第二次则曰“遭风失其所之”,“值大风,蛮军皆溺死”。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东征失败的直接原因。

第四,两次战争的叙述,都提及了具体的损失。首段史料中,除提及战舰败没外,特别提及左军使“金仇溺死”,这是高丽溺死的最高指挥官。而在随后的《年表》中,则曰:“十月,金方庆与元元帅忽敦、洪茶丘等征日本,至一歧战败,军不还者万三千五百余人。”^②。第二段史料对于元军伤亡情况,有多个数据,十分清晰地呈现出东征伤亡之惨重。在下文《年表二》中则曰:“元至元十八年,忠烈王七年五月,金方庆与忻笃(都)、茶丘征日本,至霸家台战败,军不还者十万有奇。”^③这与第一次征讨的叙述类似,字数不多,叙述简略,但是丝毫不掩饰其漠视的态度。

可见,从《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当中,高丽军队是主角,蒙古军队只是配角,日本海战作为背景而已,充分显示《高丽史》的主体性意识,并非全面叙述这场战争,而是揭示高丽军队在其中的作用,是一种选择性的历史书写。

三、《高丽史》对元东征战争中高丽将领传记之书写

纪传体史书,人物是中心;各种历史事件的叙述,也都贯彻到人物传记之中。高丽参与这场战争的将领,《高丽史》中有专传的人不多,主要有《金方庆传》,其子金忻付传、部将朴球付传;《金周鼎传》、《罗裕传》;金文底传付《李贞传》。另外,一些相关人物如李藏用、洪福源、赵彝有传。在这些传中,比较详细讨论了这次战争的是《金方庆传》,其他人物的传,对这场战争一笔带过,甚至未曾提及。根据人物生前表现,有正面叙述的,如《金方庆

^① 《高丽史》卷29《忠烈王世家二》。

^② 《高丽史》卷87《年表二》。

^③ 《高丽史》卷87《年表二》。

国的高丽人，《高丽史》一律斥之为“反人”，归之入《叛逆传》。

与把洪福源、赵彝被列入《叛逆传》相对照，金方庆则是作为正面肯定的对象。金方庆官至兵部尚书翰林学士。在两次东征日本过程中，金方庆都任高丽军队最高统帅，在其传中，对两场战争给予了较多篇幅。第一次东征，《金方庆传》述曰：

（元宗）十五年，帝欲征日本，诏方庆与茶丘监造战舰。造船若依蛮样，则工费多，将不及期，一国忧之。方庆……用本国船样督造。是年元宗薨，忠烈即位，方庆与茶丘单骑来陈慰，还到合浦，与都元帅忽敦及副元帅茶丘、刘复亨阅战舰。方庆将中军，朴之亮、金忻知兵马事，任恺为副使，枢密院副使金侁为左军使，韦得儒知兵马事，孙世贞为副使；上将军金文庇为右军使，罗佑、朴保知兵马事，潘阜为副使，号三翼军，忻即绶也。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舰九百余艘，留合浦以待女真军，女真后期。乃发船入对马岛，击杀甚众。至一歧岛，倭兵陈于岸上，之亮及方庆壻赵扑逐之，倭请降，复来战。茶丘与之亮、扑击杀千余级，舍舟三郎浦，分道而进，所杀过当。倭兵突至，冲中军，长剑交左右方庆如植，不少却，拔一篙矢，厉声大喝，倭辟易而走。之亮、忻、扑、李唐公、金天禄、申奕等力战，倭兵大败，伏尸如麻。忽敦曰：“蒙人虽习战，何以加此！”诸军与战，及暮乃解，方庆谓忽敦、茶丘曰：“兵法：千里县军，其锋不可当，我师虽少，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船淮阴背水也，请复战。”忽敦曰：“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乏之兵，敌日滋之众，非完计也，不若回军。”复亨中流矢，先登舟，遂引兵还。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侁堕水死。到合浦，以俘获器械献帝及王，王遣枢密副使张镒慰谕，命方庆先还，加上柱国判御史台事。^①

第二次征讨情况，《金方庆传》如斯写道：

七年三月，出师东征。方庆先到义安军阅兵仗王至合浦，大阅诸军。方庆与忻都、茶丘、朴球、金周鼎等发，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使通事金贮檄谕之。周鼎先与倭交锋，诸军皆下与战，郎将康彦（康师子）等死之。六月，方庆、周鼎、球、朴之亮、荆万户等与日本兵合战，斩三百余级。日本兵突进，官军溃，茶丘弃马走，王万户复横击之，斩五十余级，日本兵乃退，茶丘仅免。翼日复战，败绩。军中又大疫，死者凡三千余人。忻都、茶丘等以累战不利，且范文虎过期不至，议回军，曰：圣旨令江南军与东路军必及，是月望会一歧岛，今南军不至，我军先到数战，船腐粮尽，其将奈何？方庆默然。旬余，又议如初。方庆曰：奉圣旨，赍三月粮，今一月粮尚在，俟南军来合攻，必灭之。诸将不敢复言。既而，文虎以蛮军十余万至，船凡九千艘。八月，值大风，蛮军皆溺死，尸随潮汐入浦，浦为之塞，可践而行。遂还军。^②

这两段史实书写，清晰地呈现了东征战场另一个版本，有几个特点：第一，有关元东征作战史实的叙述，这是《高丽史》中最详细的版本，较之《忠烈王史家》的叙述，更为详细，增加了许多细节，也更为形象。这段历史书写，以金方庆为中心，意在凸显金方庆的战功及其英勇事迹，故金方庆是中心，叙述其言行，揭示他在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构成本版本的主线。诚如前面所提到的，金方庆是高丽名将，出身名门，战功赫赫。而这两次战争中，金方庆的表现，充分说明金方庆是位英勇善战的栋梁之才，值得倚重。

第二，从这段史料中看，金方庆似乎是战争的主宰，第一次战斗正酣之际，金方庆“拔一篙矢，厉声大喝，倭辟易而走……倭兵大败，伏尸如麻”，甚至蒙古主帅也称赞他“蒙人虽习战，何以加此”！在战事有利之时，他建议乘胜追击，惜不被采纳，以至于遭遇风暴，战舰损坏败没，因而大败。第二次征伐之时，也是金方庆指挥的高丽军队，“斩三百余级”，取得一场胜仗。蒙古军队则屡打败仗，洪茶丘甚至仅以身免，最终“值大风，蛮军皆溺死，

^① 《高丽史》卷104《金方庆传》。

^② 《高丽史》卷104《金方庆传》。

【论文 7】

围绕远征日本窥探到的 高丽忠烈王的政治意图

金甫桃（嘉泉大学）

[原文：韩文、翻译：李金花]

导入语

随着蒙古进入高丽，蒙古帝国的登场和扩张这一世界性事件对高丽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蒙古对高丽的影响大体上可以分为‘抗蒙’为主调的战争时期和战争以后的‘干涉期’，始于1219年止于14世纪中后期历经将近两百年的时间。先后策划过两次的‘日本远征’属于干涉期。日本远征是蒙古给日本发了要求降服的招谕碰壁后，蒙古率高丽亲自伐日的事件。

过去的主调都认为‘日本远征’是由蒙古牵头，动员高丽参与的战争。发言人并不想否定远征中高丽被动员的事实本身。发言人想强调的是，可以看出忠烈王的立场从第一次远征时的消极回避，转变成第二次远征时的积极参与。因此，本文想尝试整理一下态度变化中所隐含的忠烈王的意图和政治目的是什么。

最近的研究方向已经脱离了高丽怎样被动员到伐日的视角，将更多关注点放在高丽怎样利用了该事件。其一、如李命美所主张，高丽王的目的是借助蒙古帝国的威势巩固王位，所以发生了态度变化。忠烈王兼任日本远征推进机构征东行省的丞相一职，由此巩固了国王的地位。其二、得到蒙古帝国驸马身份的高丽王，积极利用了忠烈王的立场所要履行的‘助军的义务’。这两种观点虽然多少有些出入，但是都认为忠烈王期待的是蒙古帝国的丞相和驸马等要素带来的政治效果。

此文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详细考察忠烈王的立场。

1. 日本远征的进行过程

刚开始高丽参与日本远征是为了给身负招谕任务的蒙古使臣带路。1266年(元宗7年)蒙古遣使黑的和弘恩赴日，并要求高丽给使臣带路。高丽派宋君斐和金贊等护送，但是走到巨济岛时由于风浪太大

返回了。第二年蒙古委托高丽进行对日本的招谕，于是高丽派了潘阜携带蒙古和高丽的国书去了日本，但是日本未接受招谕无功而返。之后，前前后后有十几波的蒙古人和高丽人被派往了日本，但是都被扣押或杀害，蒙古对日本的外交招谕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

前后六次派遣的使臣都失败后，蒙古决定直接伐日。于是，又在高丽建造战船，又派使臣到黑山岛等高丽南端侦查地形。并且，以解决军粮的名义在高丽设了屯田。1271年(元宗12年)为了管理屯田，还设立了屯田经略司，并将蒙古军派驻到凤州、金州、盐州、黄州、白州、海州等十多处。高丽由于战争已经非常荒废，但是为了配合蒙古的要求不得不苦苦努力。

1274年6月，日本远征准备工作告一段落。经过几年的准备，在东征都元帅府的忻都和洪茶丘的率领下，由25,000名蒙汉军组成的第一次日本远征军起航，高丽也由金方庆任都督使，派8,000名军士、6,700名船夫、900艘战船参战。第一次远征的初期，在博多一带的战斗中蒙军和高丽的联军打了胜仗，但是战争的最终结果却是相反的。此时，金方庆率领的高丽军在博多一带占上风形势非常有利，但是天黑以后忻都主张先撤退，金方庆主张乘胜再战一场。联军最终还是按照忻都的主张先撤退，众所周知，这次错误的决策导致了联军的失败。不管怎样，因为听了蒙古将帅的命令，第一次远征以失败告终，葬身大海回不来的人也多达13,500名，可以说损失惨重。这里需要关注的一点是，高丽和蒙古指挥将帅对战势的判断和措施上发生的分歧。

第一次日本远征遇到台风还没怎么打就败了，不甘心的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去宣谕使，同时继续准备战争。直到1279年(忠烈王5年)完全征服南宋，也有了一定的余力后，加快了日本远征的步伐。此时，为了打退开始侵略南方沿边的倭寇，也为了加强在蒙古帝国内的地位，高丽也积极参与了。忠烈王被任命为日本远征的推进机构-征东行中书省的丞相(1280)，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驻扎在高丽的忻都、洪茶丘等蒙古将帅的横行霸道。

但是，高丽不得不再次承担沉重的负担。为了准备远征所需的10,000名军士、15,000名船夫、900艘战船、11万担军粮以及大量的武器，高丽调用了国家的所有生产力。第二次日本远征时，位于高丽的征东行省麾下的高丽军、蒙汉军以及位于中国江南地方的伐日行省麾下的江南军都联合起来攻打日本，但是又遇到台风损失了10多万人无功而返。

2. 高丽对日本远征的态度：日本招谕以及第一次征伐期为止

发言人在这里要关注的部分是高丽的态度。首先，看一下需要劝降日本时的初期情况。

1) [(丁卯)八年 春正月 宋君斐·金贊與蒙使，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之險，遂還。王又令君斐，隨黑的如蒙古，奏曰，“詔旨所諭，道達使臣，通好日本事，謹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濟縣，遙望對馬島，見大洋萬里，風濤蹴天，意謂‘危險若此，安可奉上國使臣，冒險輕進？雖至對馬島，彼俗頑獷，無禮義，設有不軌，將如之何？’是以，與俱而還。且日本素與小邦，未嘗通好，但對

古势力而不得已的作为。当然，不能否定这点，发言人从宏观的角度也不认为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不过，这可以说明当时高丽的政治背景，如果说是发生态度变化的直接理由则稍显欠缺。

相信一个国王在做决策时，不仅会考虑高丽-蒙古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还会考虑其他方面。因此，准备两次征伐的主体-两位高丽国王的差异应是导致态度变化的直接原因。元宗和忠烈王是父子关系，经过一个世纪的武臣弄权王权被削弱的情况下，两位国王都想回复王权。但是，理解和接纳蒙古的程度上有一些差异。下面的插曲很能说明问题。

4) [幸西北面，迎公主。順安公棕廣平公諱帶方公澈漢陽侯僊平章事俞千遇知樞密院事張鎰知奏事李汾禧承宣崔文本朴恒上將軍朴成大知御史臺事李汾成從行。(a)王責汾禧等不開剃，對曰，“臣等非惡開剃，唯俟衆例耳。”蒙古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怯仇兒。王入朝時已開剃，而國人則未也，故責之。後，宋松禮鄭子璵開剃而朝，餘皆效之。初，印公秀勸元宗，效元俗，改服色，(b)元宗曰，“吾未忍遽變祖宗之法。我死之後，卿等自爲之。”] (高麗史節要卷19 忠烈王 卽位年(1274) 10月)

以上是1274年忠烈王迎接入境高丽的齐国大长公主时，根据蒙古习俗改变发型相关发生的轶事。(a)和(b)中可以看出元宗和忠烈王对改变发型的不同态度。如(b)所示，元宗表示自己无法将发型和服饰改成蒙古式，要求臣僚们要改等自己死后再改。相反，如(a)所示忠烈王先于别人改变了发型，还责备尚未改变发型的李汾禧。这可以理解为忠烈王比他的父亲元宗更努力积极接纳蒙古的影响力。

并且，建议和筹备第二次征伐的过程中，有必要仔细分析忠烈王的建议。忠烈王在准备征伐的过程中，提了七条建议。

5) [王以七事請，“一，以我軍鎮戍耽羅者，補東征之師，二，減麗漢軍，使闍里帖木兒，益發蒙軍以進，三，勿加洪茶丘職任，待其成功賞之，且令闍里帖木兒，與臣管征東省事，四，小國軍官，皆賜牌面，五，漢地濱海之人，并充梢工水手，六，遣按察使，廉問百姓疾苦，七，臣躬至合浦，閱送軍馬。”帝曰，“已領所奏。”] (高麗史 卷29 世家 29，忠烈王 6年(1280) 8月乙未(23))

6) [小國軍民，曾於珍島·耽羅·日本三處，累有戰功，未蒙官賞，伏望追錄前功，各賜牌面，以勸來効。每一千軍，摠管千戶各一，摠把各二，花名，抄連在前。請以上將軍朴之亮，大將軍文壽·羅裕·韓希愈·趙圭·親從將軍鄭守琪·大將軍李伸·朴保·盧挺儒·安社等十人爲摠管。大將軍趙扑，將軍安迪材·許洪材·金德至·徐靖·任愷·金臣正·李廷翼·朴益桓等十人爲千戶，中郎將柳甫·金天祿·李臣伯·辛奕·崔公節·呂文就·安興·李淳·金福大·車公胤·李唐公，郎將朴成進·高世和，中郎將宋仁允，郎將玉環·桂富·金天固·李貞·徐光純·

蒙古皇帝的威望和影响力更大。因此，高丽王迫切需要在蒙古官僚体系内确保高位官职，甚至是能对行省的人事权发挥影响力的丞相的地位。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最终决策权人形式上是蒙古皇帝，但是在万户、总管等以军职为首的蒙古官职的任命上，形成了由高丽王推荐的高丽官僚担任的局面。于是，高丽王可以与蒙古官职上的高丽人维持君臣关系，这也是忠烈王积极推动二次伐日的政治目的所在。

结束语：代替结论

忠烈王既是蒙古皇帝的驸马，又是征东行省的丞相，有着高丽国王、驸马、丞相等身份。忠烈王凭借这些身份可以在高丽国内，与蒙古官僚之间的关系中确保自己的威望。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忠烈王积极利用了蒙古的伐日，尤其是二次伐日。

可以说，忠烈王的意图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效。但是，在乃颜的叛乱中打到平壤，并向忽必烈表示有意助军，这是他为了维持自己作为蒙古王室成员的威望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换句话说，依附蒙古确立和加强王权威望而做出的忠烈王的选择，最终限定了高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斡旋余地。

光宗时期引进的太子制度分为册封和东宫官的运营。通常将在位国王的长子册封为太子，赋予以血缘正统性为基础的权威，东宫官的任命和运营是为了提前打造太子即位后行使王权的政治环境。负责太子的教育和护卫的东宫官本身是为了塑造太子作为国王的资质，也是为了事先搭好将来治理国家所需的领导班子。通过史料可以确认，担任东宫官的人物通常是当时已经在高位官职，就算当时不是高管，在太子继位后还是会担任高位官职。¹⁶⁾况且，太子制度可以避免追逐王位导致的政局分裂，也有助于稳定当前国王的政治根基。太子是国王册封的，东宫官的构成中也可以看出，太子的政治人脉基础实际上包括在国王的政治根基之内。

有记录显示，忠宣王的长子-王鉴和次子王熏(后来的忠肃王)分别在 1310 年(忠宣王后 2)正月和 1313 年(忠宣王后 5)3 月以世子身份继承了王位，可见两位都是世子。两位当世子的时期而言，据推测王鉴是忠宣王复位的 1308 年 8 月以后到 1310 年正月以前，弟弟王熏是王鉴去世的 1310 年 5 月以后到以世子身份继承王位的 1313 年 3 月以前。但是，忠宣王的两位王子，尤其是继承王位的忠肃王不仅没有相关的册封记录，也没有发现组建世子府的记录。那以后的世子情况也都差不多。

13) 与蒙古讲和之前的高宗 28 年(1241)作为人质送到蒙古的永宁公王綽、忠烈王时期的带方公王澄及其儿子中原公王昱就是这种情况。此外,从忠宣王手中继承藩王地位的王暉,以孙子的身份继承藩王地位的王笃朵不花也当过宿卫。

16) 金昌谦, 2008, 《高丽显宗时期东宫官的设立》韩国史学报 33 页

继承王位的忠惠王的长子忠穆王也没有世子的记录。考虑到忠穆王即位时只有 8 岁，可能是因为太年幼忠惠王在位时还没立为世子。还有，忠宣王复位后虽然将长子立为世子，但是事实上几乎都没有打造政治根基所需的世子府的组建或确定世子地位的世子册封等。当然，这些有可能只是记录上的问题，但是考虑到太子或世子作为正式王位继承人的威望时，册封仪礼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原来的惯例是太子册封礼之后大赦天下，或将太子的生日指定为节日进行庆祝，所以实际册封以后都不留记录的情况本身值得推敲。另外，忠定王和恭愍王都不是前任国王的儿子，这可能是他们没有成为世子的原因。

尤其是忠宣王时期以后太子/世子制度没有正常运营的背景来看，该制度底层蕴含的王位继承相关的传统观念所具有的权威和规定性，在与蒙古的关系中很大程度上被削弱。这样的变化理所当然地对围绕高丽王权的政治环境带来巨大的变化。

在过去的王朝体制下，虽然太子的权力仅次于国王，也不会威胁到王权，是因为太子的权力来自于国王，其政治根基也直接挂钩到国王的根基。相比之下，通过宿卫制度形成的世子或王位继承候选人的势力根基，与国王的势力根基发生交集的同时还有差集，这部分差集随着宿卫期间以及宗室的势力会扩张。但是，下一任王位继承人不在高丽境内，在蒙古朝廷入职宿卫的情况下，国王无法控制继承人独立培养势力的过程。

高丽国王甚至都掌握不了反复上演的继承纷争中被废国王的命运。分别在 1298 年和 1332 年被蒙古废黜的忠宣王和忠惠王都被召回蒙古，再次经过宿卫期间后，分别在父王去世后复位。1332 年废黜后再次入职宿卫的忠惠王，以个人生活不检点为由送回国内的案例中看出，将他们召回蒙古入职宿卫的很大的目的是回炉重塑。不管蒙古的意图是什么，对废黜国王的上述措施不仅阻止现任国王掌握前任国王的命运，还留下前任国王复位的可能性，促使高丽权力中心的二分化，制约了国王的王权。推行所谓‘反元改革’的恭愍王给忠惠王的庶子释器扣上谋逆罪试图诛杀，后来要求送还当时在蒙古的忠宣王的孽子-德兴君塔思帖木儿的案例等，都是为了打破蒙古附属期的权力结构。

另外，宿卫制度还影响到了围绕国王的人际关系网，换句话说，国王和臣僚的关系。世子或具有王位继承机会的宗室在蒙古当宿卫时，有高丽臣僚随行，他们的作用类似于过去太子府的东宫官。王位继承人不是在高丽境内与当前的政权关系密切的臣僚建立关系打造其政治根基，而是在远离高丽的蒙古，短则几年，长则十年的期间与长期伴随左右的随行臣僚以及蒙古内势力建立关系打造其政治根据。王位继承人即位后，这些随行的人物成为国王的左膀右臂构成主要的政治根基是众所周知的事实。¹⁷⁾

随行臣僚中的一些人自己也加入宿卫，而且世代加入宿卫。与蒙古的关系中宿卫制度原来是高丽国王在政治上建立自己的核心人际关系网的重要渠道之一，同时也打开了臣僚摆脱国王的控制，直接与皇帝的人际圈发生关系的可能性。过去以国王为制高点的人际关系网围绕皇帝重组。

结束语

蒙古在高丽关系中除了采用东亚国际关系中常用的所谓的‘册封-朝贡’模式外，试图适用游牧部落之间的关系建立和维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首脑以及首脑家族之间建立直接关系的几种模式。长达三十年的战争过程中出现的国王亲朝以及纳送人质等讲和要求是在这样的脉络下提出的。尽管高丽没有积极响应这些要求，但是也根据自己所熟悉的国家间的惯例做了相应的解读和回应。在这个过程中，高丽宗室和太子的政治外交活动非常凸显，这在蒙古之前的关系中是几乎看不到的。

高丽-蒙古的关系初期，宗室或太子/世子的政治或外交上的活动，主要是为高丽的利益服务的。比如，战争时期被推出来担任讲和谈判的主体，担任正使节率领使节团出访等，起初作为人质送走的旁系宗室或太子/世子的活动也是为了国家利益。随着两国关系的进展，蒙古皇权成为实质最高权力后，局面发生了变化。权力的大小取决于与皇权的亲疏，这层关系不仅包括 1:1 的君主对君主的关系，还包括 1:多的个人之间、家族之间的关系。高丽国王即位后在王权的行使和维持中不仅要依赖于蒙古皇帝、皇室的亲近关系，还需要与形成类似关系的其他权力主体进行竞争。随着世子在蒙古朝廷效力于宿卫，高丽国王再也无法掌控世子的命运及其政治上的人际关系，而且频繁上演的重祚中，被废的国王也会被召到蒙古效力于宿卫，现任国王无法掌控被废的前任国王的命运。这样的权力结构下，高丽的宗室或世子在政治上没有必要一定跟高丽国王同进退共命运。朝廷擅自解读蒙古的要求遣使宗室的作法也显著减少。但是，蒙古与其他政治单元之间普遍使用，且构成帝国运营根基的宿卫制度下，宗室/世子的政治活动持续展开。通过首脑个人之间或统治家族之间直接建立关系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应用到高丽，影响了围绕着高丽王权的政治环境。这样变化又是触发高蒙之间各种政治事件的结构性的变化。

<参考资料> 蒙古附属国时期高丽国王位继承图

【论文 9】

北元和高丽关系的考察

-以禡王年间的关系为中心-

车林多尔济 (Ts.Tserendorj 蒙古国科学院)

[原文：韓文、翻譯：李金花]

1. 高丽对北元外交路线的变化

北元和高丽之间的关系分为'恭愍王年间的关系'和'禡王年间的关系'。恭愍王时期趁元朝和明朝展开角逐，高丽采取了加强自主性的政策。1369年恭愍王政权与元朝断交，与明朝建立了事大关系。不仅如此，还出兵征伐元朝的领土。显然，恭愍王的措施是非常突然，也是操之过急的。其实，恭愍王与明朝建立事大关系时还没有彻底断绝与北元的关系。

1372 年前后，北元的内外局势趋于稳定，对高丽也频繁开展了外交活动。但是，恭愍王固守亲明政策，北元对高丽的怀柔政策未能成功。

恭愍王之后的禑王年间开始，北元和高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恭愍王遇刺后北元将瀋王脱脱不花任命为高丽王，也许当时流传的北元替换国王的传言是真事儿。固守亲明外交路线的恭愍王于 1374 年 9 月遇害后，恭愍王主导的亲明外交路线陷入了混乱。¹⁾

恭愍王遇弒的同年 11 月左右，派到高丽征用贡马的明朝使臣-林密、蔡斌等在回国的路上到达开州站时，护送官金义杀掉明朝使臣蔡斌及其儿子后，劫持林密逃到了北元。²⁾ 作为請諡/承袭使、告讞使被派到明朝的使臣们，听到消息后中途返回。于是，高丽和明朝的友好关系事实上结束了。之后害怕被追责的大臣们都不敢担任使臣出访明朝，高丽就没机会将恭愍王的遇害和明使臣的刺杀事件向明朝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难以向明朝通报禡王的王位继承事实并得到承认。

1374 年 11 月，纳哈出派部下送来了两头骆驼和四匹马³⁾，这是恭愍王遇刺后从北元来的首批使臣。恐怕北元是想通过使臣了解一下恭愍王死后的高丽局势。

1) 金顺子, “韩国中世的韩中关系史”, 慧眼出版社, 2007, 82 页.

2)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1, 11月.

3)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禑1, 11月.

但是，将金湑派到北元的目的是为了通报恭愍王的丧事，跟禡王的册封无关。毕竟通告丧事和申请批准王位继承是两码事。高丽希望在通报恭愍王丧事的同时，将持续到恭愍王时期的亲善关系延续下去。但是，北元反过来利用高丽先派使臣的机会开始插手禡王的册封。之后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点。

同年 4 月，李仁任率众臣到孝思观向太祖的魂灵发誓，‘本国的无赖之徒挟瀋王之孙在北疆垂涎王位，我等同盟的臣子们将誓死保卫新君主。如有违，必遭天谴和宗庙降罪。’

同月，判书朴思敬从北元回来报告明德太后。

听罢，恭愍王的母亲-明德太后召仁任曰：‘宰相遣金義如元，予聞此言久矣。卿等獨不知乎’⁸⁾至于这里提到的朴思敬什么时候去的北元，没有相关的记录。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是派到北元的金湑的副使。⁹⁾

4) 《高麗史》卷 133、列傳 46、辛禠 1, 12 月.

5) 金顺子, “韩国中世的韩中关系史”, 慧眼出版社(2007), 83-84 页.

6) 《高丽史节要》卷 30、辛禡元年 4 月。

7) 《高麗史》卷 126, 列傳 39, 姦臣 2, 李仁任: “納哈出謂臣言, 爾國宰相, 遣金義請云, 王薨無嗣, 願奉瀋王爲主故, 帝封爲爾主。若前王有子, 朝廷必不遣瀋王也。”

8) 《高麗史節要》卷 30、辛禔元年 4 月：“太后召仁任曰，宰相遣金義如元，予聞此言久矣。卿等獨不知平。”

9) 池内宏,《高丽末与明朝以及北元的关系》 史学杂志, 29-1、2、3、4/1917, 满鲜史研究中世第三册, 1963, 282 页。

10) 《高麗史》卷 112, 列傳 25, 朴尙衷: “尙衷上疏曰: 金義殺使之罪, 在所當問, 幸相待其從者甚厚。是師瑋嗜義殺使, 其迹已見, 今若不正其罪, 社稷之禍, 自此始矣。”

原来这份上疏一直保留着，此时太后将上疏下发到都堂，并下令把安师琦抓入大牢。安师琦听闻逃到他府拔刀自刎，众人一拥而上乱刀砍死。¹¹⁾ 静观事态发展的李仁任说：‘金义被派到元朝都是赞成事康舜龙、知密直赵希古、同知密直成大庸指使的。’然后，把这些人统统流放边境。¹²⁾

接下来的同年 4 月，高丽将判密直李子松任命为西北面都巡问使兼平壤尹、将赞成事池霭任命为西北面都元帅、将门下评理柳渊任命为东北面都元帅，下令分别征集兵丁防范北元的入侵。不久后接到边境局势平安的报告后立即停止征集兵丁。¹³⁾

高丽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外国，国内也有有意接应瀋王的势力。僧小英秘密派几个手下去给北方的瀋王送信，‘今國家，臣弑其君，主諛臣諂，國柄專在權臣，若引兵來，大事可成。’¹⁴⁾。还有，禡王元年(1375) 9 月，泥城元帅崔公哲麾下的 200 多人造反杀害军民过了江（鸭绿江）。¹⁵⁾ 这些案例都说明禡王即位初亲元势力的活跃。

在这样的局势下，李仁任政权需要不择手段阻止瀋王被拥立为高丽国王。1375 年 4 月李仁任欲百官联名上书北元的中书省。文中写到：

师祖皇帝成就王业时，本国的忠敬王率先入朝受皇帝的恩典，皇帝以贵朝廷的世袭王和驸马之礼对待并授予了王位。还将公主嫁给忠烈王招为驸马，后来生下了忠宣王，忠宣王又生下忠肃王，都一一世袭了王位。但是，英宗皇帝时期有过江阳君王滋的儿子完泽秃 (Oljeitu)-瀋王嵩，他是我国王室的旁系，却妄想争夺王位，多亏贵朝廷慧眼而未能如愿。

还有，先王伯颜帖木儿就是作为忠肃王的亲儿子袭位，并在其 24 年通过遗诏传位给亲儿子-元子禡。原本派判密直金湑传先王的讞音，未曾想回来报完泽秃瀋王的孙子脱脱不花(脫脫不花)虽并非嫁到我国的公主的后孙，却痴心窥视王位。完全违背了世祖皇帝当初定下的规矩，望予以阻止。¹⁶⁾

但是，左代言林朴、典校令朴尚衷、典仪副令郑道传却以‘先王用计策侍奉了南方的明国，现在再去侍奉元国不合适’为由没有签名。¹⁷⁾

11) 《高丽史节要》卷 30、辛禡元年 4 月。

12) 《高丽史节要》卷 30、辛禡元年 4 月。

13) 《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禡元年 4 月。

14) 《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禡 2 年 7 月：“今國家，臣弑其君，主諛臣諂，國柄專在權臣，若引兵來，大事可成。”

15) 《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禡元年 9 月。

16) 《高丽史》卷 126、列传 39、李仁任。

看来李仁任政权拒绝脱脱不花的措施是符合当时的局势的。先王遇刺，新王还未被册封的状态下，即使是止于虚名拥立脱脱不花为国王是万分危险的，所以不管用什么计谋都得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1375 年 8 月，泥城万户报告‘瀋王母子率逆贼金义和金湑之辈已到达信州。’高丽唯恐北元入侵，立即征集各个道的军士做好了防御措施。后来发现消息不实。此时，鸭绿江以北频繁发生抢掠案件，高丽误以为金义率北元的军队攻入，后经确认并非瀋王的军队，实则难民。²⁰⁾

21) 《高丽史节要》卷 30、辛禡 2 年 5 月庚午.

辽东的北元势力一旦瓦解，下一步要收拾的就是高丽。明朝自 1371 年接管辽东开始透露出这样的心机，高丽的掌权者们看出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引导高丽重启对元关系的李仁任、池獬、崔莹等武将逐渐与北元来往，尝试利用北元来牵制对高丽越来越强硬的明朝。他们甚至考虑过，遭遇明朝攻打过来的紧急情况下，请求北元的军事援助进行抗争。

2. 事大关系重启的过程及其结局

书信反映了北元对当时的高丽实施的政策、两国之间发生的事情、北元和明朝之间的关系、明朝的狼子野心等重要的信息。扩廓帖木儿提到曾经跟‘禡王的父亲-恭愍王关系亲密’，还说高丽和北元的关系从‘丈人和女婿的关系转变为亲家的关系’，听说‘恭愍王去世后没有后嗣，所以希望拥立禡王家族的人来继承大统’。接下来解释，‘曾经派过携带相关诏书的使臣，但是到高丽遇阻。一直在等待高丽承认错误，通过高丽派去的抄儿志才得知高丽并没有背叛元，也得知了伯颜帖木儿王有儿子牟尼奴负责处理国事。’

25) 《高麗史》卷 133、列傳 46、辛禡 2 年 10 月

信上劝道：‘小国侍奉大国时必定要获得信任，才得以保住社稷’，‘如果高丽不再回到元，一定要侍奉朱元璋，必定会被朱元璋吞并，即使高丽如履薄冰地小心伺候，明朝也会掠夺高丽的财物、抢走人口、改变社稷，根本无法预测会沦落到什么地步。’，‘元正在策划恢复国土的大计，高丽应听命于皇帝，训练军士、喂养军马，与我们合作前后夹击敌人，为元的中兴事业做贡献才是正道！’，‘收信后尽快派使臣，必有北元的好消息’。北元采用了恩威并施的办法。从后来明朝和高丽之间发生的事情来看，北元早已对明朝的野心看得一清二楚。

信中提到两国关系是‘亲家的关系’，北元主动放弃忽必烈时期建立的蒙古优先的驸马关系，承认高丽是奇皇后的母国，重新定义两国是平等的亲家关系。²⁶⁾ 这是北元拉拢高丽的计策。

1376年10月，纳哈出也派了右丞九住，把高丽派去的文天式也放回来。文天式是恭愍王17年(1368)10月为了恭贺皇太子的生辰派到元的使臣，在元朝被扣八年后也回来了。收到右丞相的书信后，高丽朝廷于禡王2年(1376)10月将密值副使孙彦派到北元，将禡王的王位继承相关问题的百官联名书送到北元的中书省，信中解释禡王是根据恭愍王的遗诏继位，正等待北元皇帝的册封诏书。同年10月，高丽派开城尹黄淑卿访问纳哈出，回礼了纳哈出的使臣九住的来访。12月纳哈出派使臣送来银和羊²⁷⁾，禡王3年(1377)正月纳哈出又派使臣送来羊和马。2月北元派翰林承旨李刺的送来了国王册封令、美酒和海东青。²⁸⁾

对于北元册封禡王的事件，有些人解释说：‘摇摇欲坠的北元已经没有能力支持脱脱不花担任高丽王，还不如按高丽权臣的要求顺水推舟送个人情。’²⁹⁾ 不过，这时候脱脱不花已经去世，北元也没有可推举为高丽国王的人物。于是，北元在禡王3年(1377)2月册封禡王，重启了恭愍王18年以后中断的册封-朝贡关系。³⁰⁾ 北元册封禡王时，还给尹桓等六位下赐了平章事官职。接下来，纳哈出派部下谋求亲善，北元也派豆尔达祭奠了恭愍王的神位。在北元多方努力伸出橄榄枝的情况下，高丽才开始使用北元的年号宣光。³¹⁾同时下令‘中外决狱一遵至正条格!’³²⁾。

26) 尹恩淑，《爱猷识理答腊的活动和丽蒙关系的变化》，东北亚历史财团以及蒙古科学院共同主办“韩·蒙关系的昨天和今天”2010韩蒙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集(2010)，乌兰巴托，237页。

27)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2年10月。

28)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2月。

29) 卢启铉，《高丽外交史》(1994)，638页。

30) 金顺子，《韩国中世韩中关系史》(2007)，85页。

31)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2月。

32) 《高丽史》卷84，志38，刑法1，职制、辛禡3年：“中外决狱一遵至正条格。”

1377年3月，高丽派三司左使李子松到北元呈上册封答谢函³³⁾，还给北元皇帝和其他大臣——送礼。

还有，礼仪判书文天式担任答谢使给纳哈出送厚礼，巩固了亲善关系。派到纳哈出的文天式六月份从北元回来后，派到北元的谢恩使李子松也回来了。据说，“元朝廷的大臣们看到李子松穿朝服行礼的场景都泪流满面，感叹道：‘我们朝廷迁到北方连年苦苦征战时，还以为再也看不到这样的场面’”，厚待李子松自不必多说。³⁴⁾

册封国王的北元认为已经讨得了高丽权臣的欢心，7月派宣徽院使徹里帖木兒到高丽要求协助攻打定辽卫。³⁵⁾对于北元这是中兴的绝好机会，但是高丽正在开展两条腿走路的外交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高丽试图好言说服北元，希望采取拖延或不了了之的策略。³⁶⁾ 禡王给北元的使臣赐了带金腰带和马鞍的骏马，但是由于高丽没有答应北元的要求使臣没有收礼物。同年八月，高丽派啓稟使晋川君姜仁裕到北元³⁷⁾，姜仁裕9月份从北元差人过来通报了情况。信差带来的信息显示，平章文典成和大参政张海马与纳哈出一起操练军队，喂肥战马，计划待高丽军赶到一同攻打定辽卫。³⁸⁾

高丽急忙派军簿判书文天式推脱说，寒冷的天气不宜动员军队。高丽不敢直接拒绝派军，采取了拖延战略。11月派黄淑卿祝贺冬至节³⁹⁾，12月又派王昇送去了新年问候⁴⁰⁾。同月，纳哈出派使臣送来了160头羊和3头牦牛。⁴¹⁾

其实，不只北元想征伐定辽卫，当倭寇入侵全州时，都堂商量过元帅的人选问题。当时执政大臣之一的池籛主张‘倭寇只是扰乱边境，不用太担忧。但是，明朝的大军一旦在定辽卫设下根据地，必定很难攻下，掉转军队攻辽才是上策。’⁴²⁾ 倭寇入侵全州指的是1376年9月倭寇攻陷全州的事件。这是北元提议攻打定辽卫一年前的事情，池籛的这句话中可看出高丽的掌权势力重启北元的关系时，希望借助北元牵制明朝进驻辽东。

33)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3月。

34)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6月。

35)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7月。

36) 卢启铉，《高丽外交史》(1994), 639页。

37)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8月。

38)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9月。

39)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11月。

40) 《高丽史》卷133、列传46、辛禡3年12月。

41) Ibid.

42) 《高丽史》卷125、列传38、姦臣1，池籛：《高丽史节要》卷30、辛禡2年10月。

自禡王即位初，高丽一方面努力重启与北元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为缓和 1374 年底使臣杀害事件以后更加恶化的对明关系，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得到禡王册封而做了不懈的努力。但是，明朝一直不冷不热，外交上依然对高丽采取强硬政策。

1376 年 8 月传来了‘定辽卫将在秋天攻打高丽’的消息。高丽得到信息后派人到各个道清点军队，以防万一。⁴³⁾ 现在无法考证定辽卫攻打高丽的信息是否属实，可以肯定的是这条信息促进了高丽和北元的关系发展。其实，当时明朝忙着处理国内的问题，顾不上攻打高丽。况且，2 个月前送到高丽的文书上所提的要求，还没得到高丽的回应，这种情况下急着攻打高丽是不合常理的。很有可能这只是谣传，我们很难排除谨慎观察明朝和高丽关系发展的北元，看到明朝和高丽关系改善的兆头，传出谣言的可能性。1376 年 8 月以后，高丽和北元的友好关系加快发展，想必这件事情在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看到高丽与北元建立事大关系，明朝也开始对高丽采取安抚主义。1377 年 12 月，明朝释放了一直扣押着的丁彦等 358 人。高丽也礼尚往来，1378 年正月派判繕工寺事柳藩到明朝，谢皇帝的恩典，又派礼仪判书周谊上奏了请求恭愍王的谥号和王位继承册命的表文。⁴⁴⁾同年 6 月，高丽使臣（行人）崔源、全甫、李之富等也获释回国。

1378 年(禡王 4 年)7 月, 北元的使臣来高丽通告豆叱仇帖木儿的即位, 禡王称病不去迎接, 但是在北元使臣的迫使下国王不得不去行省迎接。⁴⁵⁾

同年 8 月，周谊和柳藩从明朝回来，带来了明朝礼部尚书朱梦炎记录皇帝的谕旨给高丽人看的文章。其主要内容是不干涉高丽的内政，也不会扣留使臣，但是语气上带有很强的‘走着瞧，就看你的表现’的意思。⁴⁶⁾

不久后的同年 9 月，高丽恢复了明朝的年号洪武。一方面是北元的皇帝驾崩，新皇即位没办法继续沿用原来的年号，另一方面跟明朝对高丽的安抚政策有关。但是，明朝看到高丽恢复洪武年号露出亲明的倾向，又恢复了强硬政策。

1378 年 10 月，派沈德符到明朝恭祝新年，同时也派版图判书金宝生答谢释放崔源，可惜明朝对高丽的态度却越来越强硬。1379 年正月，辽东道指挥司派镇抚任诚要求，释放洪武三年 11 月高丽军俘虏的辽阳地方的男女官民一千余人以及逃到高丽的明朝士兵。

47) 理由是，高丽答应派兵帮助北元。由此可见，明朝还没有打消对高丽的戒心。

43) 《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2 年 8 月。

44) 《高麗史》卷 133、列傳 46、辛禡 4 年 3 月。

45) 《高麗史》卷 133、列傳 46、辛禠 4 年 7 月.

46) 卢启铨,《高丽外交史》(1994),643页。

如上所述，高丽恢复明朝的洪武年号以后继续与北元来往。在与明朝的关系还没有正常化，持续紧张的局势下，高丽完全没有理由着急与北元断交。另一方面，也无法排除高丽采用的是恢复与明朝的事大关系后，继续跟北元来往的两条腿走路的策略。

再之后，北元和高丽之间的使臣来往极少。纳哈出的使臣最后来到高丽是禡王 9 年 (1383) 一月，使臣建议友好关系永不变。北元朝廷最后向高丽派的使臣于 1384 年 10 月到了和宁府。高丽派护军任彦忠安抚使臣并劝回，使臣遇到交通封锁逗留半年后回国。后来，北元和高丽之间没有了使臣往来。因为 1385 年开始明朝掌管了辽东，明朝在攻打纳哈出之前的 1384 年，攻打了位于纳哈出和高丽中间地段的女真部落，切断了纳哈出和高丽的连接。北元中央政府的使臣出访高丽也必须经由纳哈出直辖的领土，于是双方的来往不得不中断。不过，并不是彻底断绝，而是必要时随时可以重启的暂时性断绝。

恭愍王后即位的禡王年间开始，高丽和北元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高丽不仅与明朝维持事大关系，还尝试重新启动与北元的外交关系。

47) 《高丽史》卷 134、列传 47、辛禑 5 年正月.

2017. 8. 3. 오후 5:07

北元和高丽都需要牵制明朝，也需要在东亚维持势力均衡，高丽和北元重新启动外交关系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李仁任等掌权者顶住了对抗势力的极力反对，坚决推行重启对元关系的政策。禡王 3 年(1377)2 月北元册封禡王，借由此事恭愍王 18 年以后断绝的册封-朝贡关系重新成立。北元如此讨好高丽，高丽也恢复了北元的年号宣光。

高丽始终回避北元的主要目的——共同对抗明朝的要求。夹在北元和明朝两大国之间，高丽在外交政策上没有倾斜，同时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维持势力均衡得到了实惠。甚至还利用与北元建立的事大关系给明朝施压，迫使明朝在 1378 年册封禡王。

明朝和北元都成了高丽的事大关系国。其中，高丽把明朝视为事大关系的主要对象。禡王 4 年恢复对明外交关系后，高丽虽说仍然维持对元关系，侧重点还是在明朝。直到禡王 6 年，高丽一直与北元有使臣往来，这倒不是因为视北元为事大的对象。同时跟两个国家建立事大关系是解决当时所面临的外交问题的最佳渠道。有些观点认为，高丽与北元关系的目的在于牵制明朝提出过分的贡品要求，解决新王禡王的册封问题。⁴⁹⁾ 其实，高丽的更重要的目的是维持东亚的势力均衡，携手北元牵制越发强盛的明朝进一步扩大势力。

高丽和北元的友好关系不只对高丽有利，被赶到北方外交上处境艰难的北元，也急需恢复几乎断绝的高丽的关系。一旦改善与高丽的关系，不仅可以联合夹攻明朝，在原来的附属国都置之不理的情况下，至少是一个可以恢复国际上的名誉和权威的好机会，所以说北元的目的在于军事和外交两个层面。北元年间，两国使臣的来往次数中五分之一是北元派到高丽的，可见对于北元来说，与高丽的友好关系有多么重要。

禡王年间，北元和高丽关系的最大特征是高丽首次与北元建立了典型的册封-朝贡关系。禡王 3 年开始持续两年的这种关系，其性质与过去元朝干涉期完全不同，可以说是 160 多年前蒙古和高丽的关系刚成立时高丽所希望的模式。

49) 金顺子，《韩国中世韩中关系史》(2007)，87 页。

参考文献

I. 史料

郑麟趾等，《高丽史》，朝鲜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翻译，大地媒体。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

《元史》(A Mongolian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by Ch. Dandaa), Volume I-XXII, Foreword and textological study by Ts.Tserendorj,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ongolia., Ulaanbaatar, 2003-2004.

II. 著作

1)韩语

金顺子,《韩国中世韩中关系史》,慧眼 2007.

卢启铨，《高丽外交史》，甲寅出版社，1994

尹恩淑，《蒙古帝国的满洲统治史》，松树，2010。

2)蒙语

Ч.Далай, Монголын түүх (1260-1388), УБ., Эрдэм, 1992.

III. 论文

1)韩语

高惠玲,《对李仁任政权的考察》,历史学报第91辑(1981).

金塘泽,《高丽禔王元年(1375)围绕着重启对外外交关系展开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震檀学报 83 (1997)

尹恩淑,《爱猷识理答腊的活动和丽蒙关系的变化》,东北亚历史财团以及蒙古科学院共同主办“韩-蒙关系的昨天和今天”,韩蒙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集,乌兰巴托(2010)

车林多尔济,《十四世纪后期东亚国际形势以及高丽和北元的关系》,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学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

许兴植，《高丽末年李成桂的势力基础》，历史和人的对应：高柄翊博士花甲纪念史学论丛，宇宙出版社（1984）

2) 其他

池内宏,《高丽末年与明朝和北元的关系》*史学杂志*,1917,29-1、2、3、4

Ts.Tserendorj, 《A royal rescript of Emperor Ayushridar of Mongolia to the Koryo king and some issu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rthern Yuan and Koryo》, *Acta Historica* No10, Mongolian State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Ulaanbaatar, 2009.

另一方面,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跨地区的文化交流促生了百科词典式著作的诞生。这些“类书”中出现的饮食相关项目和饮食类专业书籍,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大元帝国的饮食情况,反映多元化的饮食文化。其中的代表作品有《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和《事林广记》,这些书籍介绍了当时在民间食用的饮食菜品,据此可以掌握当时饮食文化的实际情况。此外,《饮膳正要》里记载着当时蒙古统治阶层所食用的菜品和料理,是力证大元帝国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的贵重资料。有趣的是,出现于这些类书的烹饪方法同样收录在了17-18世纪朝鲜的日常生活用书《山林经济》和农书《林园经济志》中,这为了解蒙古帝国饮食烹饪知识的传播路径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二、蒙古饮食文化传入韩半岛的历史背景

：以高丽和蒙古之间的人员流动为中心

首先我们可以想到的是，下嫁于高丽的王后们和她们的陪嫁侍从“怯怜口”。自1274年忠烈王与忽必烈之女忽都鲁揭里迷失成婚开始，两国通婚成为一种惯例，一直延续到恭愍王一代，历时80多年，前后共有7名公主下嫁高丽国王。她们往往直接介入高丽王朝的政治，行使了巨大的影响力，从而其侍从怯怜口也随之荣升为高丽的新兴统治阶层⁷。这些怯怜口原来是属于蒙古名门望族的奴隶，跟随蒙古公主来到高丽，其具体人数规模目前难以掌握。除了他们，王族女性出嫁时陪同的家臣，即“媵臣”们也一同来到了高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被称为“印侯”的蒙古人忽刺歹、回回人三哥、党项人式笃儿，另有高丽人车信也辅佐了忽都鲁揭里迷失。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蒙古公主下嫁高丽时通常有6-7人规模的随行队伍，主要是由蒙古、色目、汉、高丽等出身的陪臣和奴仆所构成。因此，元朝的饮食文化很可能是通过以蒙古王后为首的蒙古统治阶层传入了高丽。

⁷ Ko Myeongsu 《忠烈王时代怯憐口（怯怜口）出身官员》，载《史学研究》118，2015，235-236页。

国为了治理占领地区而向其派遣的监督官。蒙古曾于1232年第一次向高丽的开京和西京及北界派出72名达鲁花赤，而他们却被高丽人处死。之后于1260年，高丽与蒙古进行和解并联姻，束里大和尚被任命为达鲁花赤，其主要任务是监督高丽王室的出陵，并统帅蒙古驻军。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就回国了。此后在高丽元宗十年（1269），高丽权臣林衍造反废黜了元宗，蒙古伺机再次派出达鲁花赤，并于1270年二月任命脱朵儿为高丽的达鲁花赤。此后一直到1278年，蒙古向高丽共派出了7名达鲁花赤，其中脱朵儿和黑的的是蒙古人出身，另有汉人焦天翼、李益、张国纲和契丹人石抹天衢等。这些官员当中偶有与高丽统治阶层通婚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270年高丽大臣金莲家族，应脱朵儿的要求与其联姻⁸；1289年赴任于耽罗的达鲁花赤塔刺赤娶了内侍郑孚之女为妻⁹；1289年蒙古使臣阿古太与高丽功臣洪奎长女成婚等事件¹⁰。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推测蒙古习俗与文化是经由统治阶层之间的通婚交流传入了高丽社会。

此外，高丽曾奉元朝之命开设了众多鹰坊，以便饲养猎鹰。据目前统计，元朝开设的鹰坊规模为250户。这些鹰坊的负责人是尹秀和朴义等高丽人，但实际去管理和饲养猎鹰的是由蒙古大汗派遣的猎鹰达人鹰坊子郎哥歹群体，他们由大汗亲自派到高丽庆尚道荣州等地¹¹。由此可见，实际运营鹰坊的是蒙古人。

1266年以来，元朝为了应对同日本交涉、攻打南宋，让高丽打造军舰并负担军费。1269年，高丽林衍叛乱，蒙古军队伺机入驻高丽。目前我们不清楚元朝具体的派兵规模，但有记载说，大臣蒙哥都为平定林衍之乱率领两千兵马驻扎西京¹²。于此同时，头辇哥国王所率领的大规模军队也曾赴西京担任护送元宗的任务。1270年十二月，元朝朝廷向高丽增派两千兵马实行屯田，随即又派忻都和史枢领兵五千屯田，再让洪茶丘率领两千名高丽领民实行屯田¹³。屯田的目的在于筹备出征日本，因此除了上述军队，还在王京、东宁府、黄州、凤州等十一处实行屯田并设置经略使¹⁴。在此之后，于1275年又将由南宋军组成的蛮子军一千四百人分派驻扎于海州、盐州和白州。据记载，元朝曾在1276年发放币帛给杨中信，使其给此蛮子军中的五百人娶妻¹⁵。1278年，元朝撤回了达鲁花赤，这些屯兵也依忽必烈之命废止，但仍有部分人员留在了高丽¹⁶。在高丽进行屯田的这些人员当中有蒙古人、汉人、南宋人、高丽人等，其构成比较复杂，且如前所述，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在驻扎在高丽期间与高丽人通婚生活。依据这些情形，蒙古帝国的饮食文化通过这些来自元朝的屯田势力传入高丽的可能性也是较高的。有人已经提出过，烧酒的蒸馏技术正是通过征发来到高丽地区屯田的这些蒙古人传入的概率非常高¹⁷。

1273年，丽蒙联合军成立，以镇压将据点迁至耽罗的“三别抄”势力。从此耽罗就沦为元朝的直辖地，直到蒙古帝国的晚期。这一时期赴任耽罗的蒙古达鲁花赤、驻军以及牧人们在他们居住期间给耽罗地区留下了众多蒙古文化的痕迹¹⁸。耽罗达鲁花赤曾命令屯田兵力和本地居民开设牧场来饲养牛马，当地的肉食文化与肉汤、酒等饮食文化至今带着浓厚的蒙古色彩。

⁸ 《高丽史》卷二六<元宗世家>

⁹ 《高丽史》卷二九<忠烈王世家>

¹⁰ 《高丽史》卷一〇六<洪奎传>

¹¹ 《高丽史》卷一二四<嬖幸传>

¹² 《高丽史》卷二六<元宗世家>

¹³ 《元高丽纪事》

¹⁴ Lee Kaeseok《高丽对元关系研究》，知识产业社，2013，178页。

¹⁵ 《高丽史》卷二九<忠烈王世家>

¹⁶ 《高丽史》卷二九<忠烈王世家>

¹⁷ 李盛雨《韩国食品社会史》，教文社，1984，216页。

¹⁸ 关于蒙古的耽罗统治和在但多居住的蒙古人的研究，请参考 Bae Sukhui《元朝的耽罗统治与移住以及其痕迹》，载《中国史研究》76，2012。

除了访问过高丽的蒙古人群体，高丽也有直接访问过大元帝国的人群，而这些人也很可能将蒙古饮食文化介绍到了高丽。高丽文人闵思平曾跟随忠定王亲身访问过大元帝国，在他的文集《及庵诗集》里就曾提及“饮膳经”即“饮膳正要”¹⁹。而此书是元文宗图帖睦尔时期的太医院饮膳太医忽思慧于1330年为大汗所写的药膳书，书中介绍了大量的元朝菜品。因其在闵思平的诗文中出现，所以我们可以推测《饮膳正要》和书中所介绍的元朝菜肴已于高丽晚期传入了高丽地区。

三、韩半岛饮食文化中的蒙古帝国因素²⁰

自高丽初期，朝廷一直鼓励畜牧业，但在当时马多用于战场和搬运，而牛则主要用于农耕，因此牛马的食用比例非常低。同时高丽时期佛教香火兴旺，官方也曾数次颁布屠杀禁止令²¹，甚至到了成宗时期，敕令禁止肉食²²。受其影响，高丽的肉食文化变得更加萎靡。《高丽图镜》风俗篇里记载了高丽人的宴会场景，对餐桌上饮食的描述极为简朴²³。“今麗人，於榻上復加小俎，器皿用銅，鱸膳魚菜，雖雖然前進，而不豐腆。”对于高丽的肉食文化，徐兢又在〈杂俗·屠宰〉中记道：

夷政甚仁，好佛戒殺。故非國王相臣，不食羊豕，亦不善屠宰。唯使者至，則前期蓄之，及期將用。縛手足，投烈火中，候其命絕毛落。以水灌之，若復活，則以杖擊死。然後剖腹，腸胃盡斷，糞穢流注。雖作羹胾，而臭惡不絕。其拙，有如此者。²⁴

通过这一纪录，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在高丽除了王室成员，其他人很难食用肉类，且高丽的肉食貌似只是为了宴会或待客而准备的特殊菜肴。在肉食尚未普及的情况下，高丽人的屠宰技术也相对落后。当然，当时的高丽也有机会接触狩猎民族的饮食文化，其北部边疆就与契丹和女真接壤，并频繁交往。但相对来说，高丽内地的肉食文化并未普及开来。

但是自从1260年蒙古与高丽和亲之后，高丽地区的肉食文化开始出现扩散的趋势。据编纂《高丽史》的史家记载，忠烈王的后妃齐国大长公主在听闻母亲的讣告后很悲痛，其间却仍然维持了肉食。看来在史家眼中，丧事期间不禁肉食的蒙古后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蒙古公主嫁入高丽王室后，日常饮食仍然以肉食为主。我们推测，是蒙古人让高丽人产生了肉类也可以当作日常食品的观念。

蒙古与高丽和亲之后，蒙古大汗曾赐羊给高丽国王当做礼物。1263年，忽必烈下诏于高丽文宗，并赐羊五百只，文宗将此分与诸王及五品以上官员²⁵。1297年，大元帝国的太后为忠烈王祝寿，赐羊五十只、天鹅十只及蒙古大汗御酒²⁶。至忠烈王时期，记录中开始出现，在高丽王室

¹⁹ “丹殼吹香風淡淡，黼皮弄色雨溟溟，心知此物真仙味，故入皇元飲膳經”（闵思平，Yu Hojin 译，《及庵诗集》，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13）

²⁰ 第三部分是根据笔者之前的论文的部分内容进行整理和补充而成。（详情参考，赵阮《〈饮膳正要〉和大元帝国饮食文化的东亚传播》，载《历史学报》233，2017）

²¹ “禁屠杀，肉膳亦买市廛以进”（《高丽史》卷二光宗十九年）；“自今年限三年，禁中外屠杀”（《高丽史》卷八文宗二十年一月）

²² “禁屠杀，断肉膳”（《高丽史》卷三成宗八年十二月）

²³ 徐兢《高丽图镜》卷二二〈杂俗·乡饮〉

²⁴ 徐兢《高丽图镜》卷二三〈杂俗·屠宰〉

²⁵ 《高丽史》卷二五〈元宗世家〉

²⁶ 《高丽史》卷二一〈忠烈王世家〉

主持的宴会上已经是美酒与羊肉来设宴²⁷。据此推测，蒙古和高丽和亲之后，原来作为蒙古人主食和中国北方佳肴的羊肉，登上了以高丽王室为中心的统治阶级的餐桌。只是高丽的风土气候不适于发展畜牧业，所以牧羊产业一直没能在高丽发展起来。综上得知，到了高丽晚期，羊肉和猪肉已经在高丽上流阶层的祭祀和宴会场合广为使用，而平民百姓则食用了便于饲养的鸡肉和狗肉²⁸。

此外，随着高丽晚期肉食的普及，原为用于农耕的牛肉也开始被当做食材。在与蒙古和亲之前，牛肉相比于羊肉和猪肉很少被食用，只有零星记载表明，少数上流阶层曾有过食用牛肉的情况。而在和亲之后，蒙古朝廷下令高丽要进贡牛和天鹅。在1271年元宗时期，蒙古要求高丽进贡六千头农牛，同时对于来到高丽屯田的士兵来说，牛肉的肉用价值丝毫不低于农用价值。迫于蒙古的农牛进贡要求，高丽开始饲养牛群，这不仅让牛群个体数量增加起来，还对食肉观念在高丽社会扎根的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²⁹

在《居家必用》庚集中介绍了元朝的民间烹饪文化，而其中相当多的烹饪方法同样记载于17世纪的朝鲜实学书籍《山林经济》。根据金尚宝的研究，元末类书《居家必用》里出现的菜品当中有60%以上原封不动地收录在了17世纪朝鲜《山林经济》的“治膳”篇，从而证明肉类烹饪方法是在高丽晚期由元朝传入高丽的。只不过元朝主要以羊肉为材料做肉类菜品，到了高丽和朝鲜就以牛肉和猪肉替代了羊肉³⁰。

关于从《居家必用》引用到《山林经济》的肉类烹饪方法，可以举下面例子。从《居家必用》“烧肉品”部分引用了烧肉、羊膊、羊肋、羊耳舌、野鸡、鹌鹑、羊胛肪、野鸭；从“煮肉品”的“煮诸般肉法”引用了羊肉、败肉、煮驴马、煮肥肉、牛肉、马肉、獐肉、鹿肉、熊掌。烧肉指“烤肉摆设之法，除了直接在火炉烤的羊肉之外，其余所有的肉类均用钎子串起来，蘸以油、盐、酱、细料、酒、醋等，涂一层薄面皮，反复翻烤于炭火之上，肉熟后去掉面皮摆上”，介绍了羊膊、羊肋、羊耳舌等的烧烤方法；煮诸般肉法则介绍了牛、羊、驴、马、鹿、獐、雁、熊掌等硬肉、肥肉、败肉的各种煮法³¹。韩半岛从高丽晚期开始普及肉食，但肉类烹调方法并不发达，只有风干、腌制等。由此可见，《居家必用》向半岛提供了丰富而有用的肉类烹调知识和信息，因其包含了从北宋到元朝大量的烹饪方法。

自蒙古帝国形成以来，大量的蒙古及蒙古占领地区的外来文化流入了东亚各国。综观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确认，蒙古与高丽和亲之后，肉食文化通过王后、官员、商人、军队等人群为媒介传入高丽，使得高丽社会出现了肉食变得更为普遍、肉食范围逐步扩散的倾向。而在此之前，肉食仅限于高丽的少数上流阶层，而基层则受佛教文化影响，肉类消费量非常有限。

与肉食相伴而来的，还有酪和酥等乳制品，尤其是高丽屈服于蒙古之后，其生产量有大幅提高。朝鲜时代亦有记载，朝鲜王室“以酪粥为常膳”³²。酪粥又名驼酪粥，有趣的是“驼酪”在蒙古语是指将牛奶发酵而成的酸奶。这表明，在朝鲜时代酸奶不仅作为御贡品在王族当中消费，也被当做朝鲜上流阶层的日用食品和接待外国使臣的食品。朝鲜时代设有“司仆寺”、“内医院”等机构专门负责畜牧，并由这些机构负责向王室进奉乳制品。另外，朝鲜初期还存在专门制作驼酪粥等乳制品的集团，叫做“酥油赤”。他们是居住在平安道的蒙古人，原来主要从事于屠宰行业，在朝鲜初期负责向司饔房进献酥油，而后者是朝鲜王室御膳房的采购机构。

²⁷ 《高丽史》卷二二一<忠烈王世家>

²⁸ 李盛雨《高丽之前的韩国食生活史研究》，乡文社，1978，362-362页。

²⁹ 李盛雨，同上本，364页。

³⁰ 金尚宝，同上本，331-332页。

³¹ Kim Hyesuk《〈居家必用史类全集〉的饮食烹饪法内容和朝鲜的引用》，载《东亚书籍的文化史与朝鲜时代饮食知识体系：以〈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为中心》，77-80页。

³² 《朝鲜王朝实录》三四<仁祖实录>仁祖十四年（国编影印本）

可是到了朝鲜世宗三年（1421），朝廷下令废止向其采购³³。这些酥油亦很可能是从高丽晚期开始就已经在韩半岛北部地区定居的蒙古人，这表明朝鲜初期在半岛境内的蒙古人已经专门从事于乳制品制作行业。从中可以看出，朝鲜王室存留了以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饮食文化。那么，韩半岛的乳制品食用历史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明宗年间，翰林学士李纯佑上奏四机所有奶牛全被调用制作炼乳以备八关会之事，并指出此举恐有伤奶牛和幼牛³⁴。这表明高丽时期上流阶层已开始制作乳制品并将其用于国家大型活动。到了高丽晚期，开始出现乳制品生产专业化的倾向。在禡王时期专门设有“乳牛所”来制作御用乳制品，负责制作牛酪进献给王³⁵，王时而也将这些牛酪赐给近臣作补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测高丽晚期已设有专门机构向王室进奉乳制品，而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朝鲜王朝。而高丽王室常食乳制品的习俗则源于主食乳制品的蒙古习俗，且这些蒙古饮食习惯是通过蒙古王后和官员们传入高丽的。

除了肉类和乳制品之外，本文还注意到，蒙古帝国的饮料“舍尔别”的传播路径。进入朝鲜时代，佛教逐渐衰亡，替代茶的饮料也随之得到了发展。在此过程中，蒙古帝国的饮料也被介绍到了韩半岛。朝鲜晚期的日用生活书籍《山林经济》收录了“渴水”即清凉饮料，介绍了“木瓜渴水”和“五味渴水”³⁶；而《林园经济志》则介绍了御方渴水、林檎渴水、木瓜渴水、葡萄渴水、香糖渴水³⁷。这些饮料的制作方法照搬了《居家必用》“渴水番名摄里白”项下的内容，相同内容在《饮膳正要》里被介绍为蒙古大汗所饮用的“舍尔别”。

“渴水番名摄里白”是指番名及波斯语叫做“摄里白”，其种类有用桂皮、丁香、桂花等制作的“御方渴水”，当年度林檎果汁制作的“林檎渴水”，杨梅果汁制作的“杨梅渴水”，木瓜制作的“木瓜渴水”，五味子汁和蜂蜜熬制的“五味渴水”，葡萄汁加蜂蜜制作的“葡萄渴水”，松糖、藿香叶、生姜等熬制的“香糖渴水”，葛粉、郁金、山梔、甘草等制作的“造清凉饮法”等。其中用五味子汁和蜂蜜熬制而成的“五味渴水”的制作方法跟《饮膳正要》里介绍的“五味子舍尔别”非常相近。

文献名	原文
『飲膳正要』	五味子舍兒別：新北五味十斤，去子，水浸，取汁；白沙糖八斤，煉淨。右件一同熬成煎
『居家必用』	五味渴水：北五味子肉一兩爲率。滾湯浸一宿。取汁同煎。下濃豆汁對當的顏色恰好。同煉熟蜜對入。酸甜得中。慢火同熬一時許。涼熱任用。
『事林廣記』	五味渴水：北五味子肉一兩爲率。滾湯浸一宿。取汁同煮。下濃黑豆汁對當的顏色恰好。同煉熟蜜對入。酸甜得所。慢火同熬一時許。涼熱任意用之。
『山林經濟』	五味子滾湯浸一宿。取汁同煮。下濃豆汁對當的顏色恰好。同煉熟蜜對入。酸甜得中。慢火同熬一時許。涼熱任意用之。 ³⁸

³³ 《朝鲜王朝实录》二<世宗实录>世宗三年

³⁴ 《高丽史》卷五九<李纯佑传>

³⁵ 《高丽史》卷一三五，禡王十一年

³⁶ 洪万《山林经济》（坡州，景仁文化社，1973）

³⁷ 徐有渠《林园经济志》（首尔，保景文化社，1983）

³⁸ 韩国传统知识门户网 <http://www.koreantk.com/ktkp2014/kfood/kfood-view.view?foodCd=109513>（搜索日期：2016年8月20日）

《饮膳正要》、《居家必用》、《事林广记》、《山林经济》等文献里出现的五味渴水的制作方法都是在五味子汁里加入糖分熬煮而制，其方法基本相近。另外，朝鲜晚期的《山林经济》里是直接引用了《居家必用》里面五味渴水的制作方法，可见它是参考了《居家必用》这本书籍。但是仔细阅读之后，我们可以在细节上发现，各书籍在选材上存在一些不同之处。《饮膳正要》使用的是白沙糖，而《居家必用》、《事林广记》《山林经济》里面都是采用了在五味子里加入豆汁熬煮的，最后再添加蜂蜜放凉的方法；且与《居家必用》、《山林经济》里记载为加入豆汁不同，《事林广记》里特别记载为“黑豆汁”。关于五味渴水制作方法的这种差异，可能是源于各地区的风土和自然环境的不同。

在《饮膳正要》里，砂糖和白沙密（即白沙塘）作为甜味调料经常用于多种菜肴。在当时，中国生产砂糖的专门机构砂糖局是位于杭州³⁹，而泉州的永春地区则是白沙糖的主要产地，因为在这些地区居住着掌握制糖技术的穆斯林和犹太人。这些技术是通过从阿拉伯半岛迁到泉州并定居的技术人员传入的，并且此地区生产的白沙糖是直接进献到大都的蒙古宫廷⁴⁰。蒙元宫廷里饮用的五味子渴水，在加上了通过西域传入的白沙糖技术的点睛之笔后，作为珍贵饮料进献到王室。与此相对应的是日用书籍里出现的五味子加豆汁的渴水，因其食材比较低廉，成为了老百姓的饮料。而在韩国，其传统是同五味子一起加入绿豆来制作五味渴水，这是因为绿豆作为韩半岛的主要生产豆类农产品，比较容易买到，且更合韩国人的口味。

四、结论

蒙古在13世纪建立了庞大帝国，从此蒙古帝国的影响遍及了东亚的政治、社会、制度等各个领域。本文主要从文化方面考察了“蒙古袭来”东亚各国的影响。

欧亚大陆在蒙古帝国时期迎来大规模的交流与融合。这一充满活力的过程给帝国的中心和占领地区的文化带来了变化，有时甚至完全改变一些地区的原有文化面貌。大元帝国的中心是各地区文化互相碰撞和交流的场所。当时蒙古的政策十分开放，大批录用了蒙古、畏兀儿、西藏、波斯、汉、高丽等民族当官员。又在忽必烈执政时期，打通和建立了海运体系，打下了运送物资和商品流通的坚实基础，各个占领地区的物资开始大批集中到大都，使得帝国的中心在人员和经济层面出现了多种文化和谐共存的局面。最直观地表明这一时期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大融合的现象即是饮食。从西亚、中亚一直到东南沿海和高丽，蒙古大汗可以尝遍从世界各地进献而来的山珍海味。

在1260年蒙古与高丽和亲之后，双方的人员交流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帝国的饮食文化也自然而然的传入韩半岛地区。下嫁高丽的蒙古王后和她们的陪嫁家臣和侍从、达鲁花赤等蒙古外派官员、蒙古驻军和屯田人群以及访问过大元帝国的高丽人，都在这一时期充当了传播帝国饮食文化的媒介人，给高丽原有的饮食文化带来新要素和新观念。饮食文化是需要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和交流才能缓慢变化的领域。高丽和朝鲜接受了部分大元帝国的饮食文化，这本身就反映了蒙古与高丽在历史上有过长期而广泛的接触与交流。

1260年和亲之后，原来受佛教文化影响而极少食肉的高丽引进了蒙古的肉食文化。但高丽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接收大元帝国的饮食文化，而是根据实情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例如肉类处理方法和烹调方法传入之后，原有的羊肉被牛肉和猪肉所替代。高丽晚期的王室和上流阶层还经常食用乳制品，而这一文化一直传承到朝鲜时代。

另外，大元帝国的饮料文化也传入了韩半岛，并受到了有选择性的改造和变化。朝鲜时代

³⁹ “杭州砂糖局宦皆主体，回回富商也”《山居新话》（《四库笔记小说从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⁴⁰ 尚衍斌，同上本，66-69页。

佛教逐渐衰亡，原来喝茶的习惯，也逐步被花菜（五味子果茶）、蜜水、甜米露、水正果（生姜桂皮茶）等替代，清凉饮料和功能饮料也随之发展。14世纪《饮膳正要》里介绍的清凉饮料“舍尔别”的制作方法，在17-18世纪朝鲜晚期的日常生活书籍《山林经济》和农书《林园经济志》以“渴水”的名字被介绍到了韩半岛。舍尔别原为西亚地区的清凉饮料，后被介绍到蒙古宫廷，历经宋元两代本土化，在其过程中被称作“渴水”，并用豆汁代替白沙糖来调出甜味。此后，渴水在高丽晚期、朝鲜初期传入韩半岛，经过选择性改造，最终主要材料固定为五味子和绿豆。

【论文 11】

“深簷胡帽”考 一种女真帽式在蒙元时代的盛衰史

张佳 (复旦大学)

一. 引言：从一则史料的校勘说起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1368年2月29日），即位仅仅三十八天的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颁布了著名的革除“胡服”¹令，号召臣民“复衣冠如唐制”，也即恢复唐代的衣冠样式，以此显示新王朝在文化上对“中国正统”的继承。《明太祖实录》概述和节录了这一诏令的内容，云：

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辮发椎髻，**深裆胡俗**，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辮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字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不得服两截胡服，其辮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²

在中国近世文化史上，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屡屡为研究蒙元史和明史的学者所引用。不过，这份诏令所言及的服饰名物，笔者尚未见有专门的探讨。今天通行的史语所校印本《明实录》，系据多种明清抄本整合而成，虽经校勘，讹误依然众多。本条诏令中文字扞格之处，亦未见有很好的校勘与疏通。

¹ 本文中所使用的“胡服”、“胡化”、“华夷”、“夷夏”等词汇，均系为了便于表达而沿用历史惯称，并不包含价值倾向。

² 《明太祖实录》卷 30，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第 525 页。

例如，“深檐胡俗”一句，“檐”依据《洪武正韵》等字书的解释，即古代服饰配件中的“蔽膝”³，于此文意难通。《太祖实录校勘记》此处云“旧校改‘俗’作‘帽’”⁴，但“深檐胡帽”一语，文意依旧晦涩。幸运的是，嘉靖以降，随着明代诸朝《实录》的传抄出宫，抄撮《实录》纂修各体史书，在明后期史家当中蔚为风气。周藩宗正朱睦㮮（1517-1588），在分类纂录洪武朝政事的《圣典》一书中，引用《实录》此条，作“深簷胡帽”⁵。嘉靖《宣府镇志》和顾炎武《日知录》引及此一诏令，也均作“深簷胡帽”⁶。此外，从诏令上下文语境推断，“辨发椎髻”描绘元代发式、“袴褶窄袖”描绘衣式，“深簷胡帽”描述元代帽式，文意允切。因此，综合考虑以上因素，通行本《明太祖实录》革易“胡服”诏令，“深檐胡俗”一词，应当校正为“深簷胡帽”；“檐”是“簷（异体作‘檐’）”之形讹，“俗”则系涉上文“胡俗”而误。

然而,“深簷胡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帽式?其在元代流行程度如何?元明易代之后,是否又真的随着“胡服”禁令而从民众日常生活当中消失?这些更为深入的追问,远非文本校勘所能解决,而应从元明史料、尤其是能够反映社会生活实态的图像资料当中,寻求答案。

二. 正名：元代“瓦楞帽”考误

顾名思义,“深簷胡帽”是以“深簷”作为特征的。考察元代图像材料不难发现,这类造型颇为奇特的帽式,在元代甚为常见;而且在较早的时候,已经被研治中国服饰史的学者注意到。沈从文先生(1902-1988)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1年初版于香港),在考订元至顺(1330-1332)刻本《事林广记》所载打双陆图(参看图一)时,首次将图中“官员”所戴的这种深簷、四角、方形的帽式,命名为“四方瓦楞帽”



一

⁷。沈氏这部著作，是中国服饰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影响极巨。

“瓦楞帽”的命名，一直被后来的服饰史著作所沿用。不过，这种帽式虽然以“四楞”（或曰“四角”）

³ 宋濂等纂：《洪武正韵》卷6。

⁴ 《明太祖实录校勘记》，第103页。按，《校勘记》此处以“胡俗衣服”四字为句，并不妥当。

⁵ 朱睦㮮：《圣典》卷9《易俗》，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册，第342页。

6 嘉靖《宣府镇志》，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察哈尔省》，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70年，卷20，第216页。

⁷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四六《元代玩双陆图中官僚和仆从》，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535页。

为常见，但也偶见六楞者，因此研究者又创造出“四楞瓦楞帽”、“六楞瓦楞帽”等等名目⁸。

中国古代名物研究的难点在于，图像资料中的、或者出土的物品，本身往往没有自名，因此很多物品如何定名，便成为难题。在无法与确凿的文献材料进行比对的情况下，研究者根据物品的形制来命名，便成为一个权宜的办法。



二、圖

实际上“瓦楞帽”一名，并未见于任何蒙元时期的文献；

沈从文先生如此定名，也仅是一种权宜之举。幸运的是，在日本覆明洪武四年刊本《魁本对相四言杂字》（现存最早的看图识字课本）当中，这种帽式清楚地自名为“幔笠”（参看图二）⁹。在元代文献当中，又写作“幔笠”；因其形状为方形、迥异于其他的笠帽样式，又被称作

“方笠”。而且这种笠子独特的“深簷”样式，成为不少元人吟咏的对象。例如，散王和卿描绘秃发者以幔笏遮羞的滑稽小令《天净沙·咏秃》，即云：

笠儿深掩过双肩，头巾牢抹到眉边。款款的把笠簷儿试掀，连慌道一句：“君子人不见头面”。¹⁰

曲中所谓“笠儿深掩过双肩”，无疑是对幔笠“深簷”特征的夸张描写。

如果仅仅是恢复“幔笠”(或“方笠”)这一历史本名,似乎完全无需如此大费笔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沈从文将幔笠权宜地定名为“(四方)瓦楞帽”,却意外地误导了明代服饰史、乃至元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原因在于,“瓦楞帽”一名虽然迄今未见于任何蒙元文献,却大量出现在明代后期的史料当中。明代的瓦楞帽,因其帽顶折叠、形状似瓦而得名,在晚明人物画像当中极为常见(参看图三,曾鲸[1568-1650]绘张卿子像)。在沈氏《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引发



三三

巨大影响之前，名物词典中有关“瓦楞帽”的解释不误，如华夫等主编《中国古代名物大典》（济南出版社，1993年）云：

瓦楞帽，省称“瓦楞”，一种顶部折叠如瓦楞的帽子，明代平民所戴。¹¹

⁸ 参看赵刚等著：《中国服装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7页。

⁹ 《魁本对相四言杂字》，收入《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15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344页。

¹⁰ 杨朝英纂：《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3，中华书局，1958年，第1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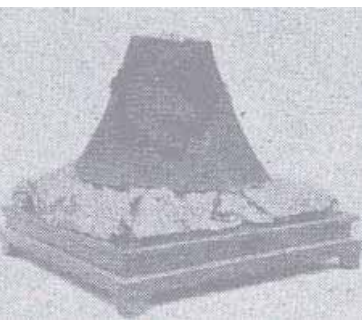
¹¹ 华夫等编：《中国古代名物大典》，济南出版社，1993年，第529页。

同的是，此处的幔笠为尖顶。元代常见的方顶幔笠，见于金大安二年（1210）山西侯马董玘墓砖雕（参看图五，顶部有帽饰）。

图五



图六



圖七



从目前所见材料推断，这种源于女真的帽式，大约从金代晚期开始，在中原地区的汉族民众当中流行。蒙元早期的北方墓葬当中，出现了较多的此类图像与实物材料。如山西大同冯道真墓（1265 年）出土藤制幔笠一件，稍后的王青墓（1297 年）则出土藤、草幔笠各一件（图六）¹⁵。陕西蒲城洞耳村壁画墓（1269 年），则充分反映了蒙古国时期北方汉、女真和蒙古三种文化的交融（参看图七）。从姓氏和籍贯来看，该墓男女主人应该皆为汉人，但却有蒙古名；壁画中的人物，均穿着带有女真（左衽、幔笠）和蒙古（腰线袄、罽罽冠）混合风格的服饰。以上这些都显示，早在蒙元前期，幔笠已经成为北方民众的重要日常用品。

不过，中国南方的情形并非如此。在长期宋金对峙的巨大军事压力下，儒学理论当中的“华夷之辨”，成为南宋朝廷凝聚民心、一致对外的有力精神武器。这不仅体现在南宋的思想文化上（例如，被南宋士人作为教材的胡安国[1074-1138]《春秋传》，便以高标“攘夷”为特色¹⁶），也反映在日常生活当中。南宋朝廷和士大夫，对异族风俗习尚的渗透，抱有极度的警惕。绍兴年间时局刚刚稳定，宋高宗“念境土地未复，将用夏变夷”，下令禁止市井百姓“效胡乐、胡舞，长跪献酒”等女真式的娱乐活动¹⁷。对于由金朝投奔来的“归正人”，南宋政府在给予安置的同时，也一再要求他们不得继续“胡服”¹⁸。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有人对临安民众效习“胡俗”发出警告，这是反映南宋社会日

受沈从文的影响，将图中的幔笠称作“瓦楞帽”。女真人在大规模接受汉文化之前，乐器较为简单，《三朝北盟汇编》谓：“其乐则唯鼓、笛，其歌则鹧鸪之曲”。

¹⁵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¹⁶ 参看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收入《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 2009 年，第 69-87 页。

¹⁷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10，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436页。

¹⁸ 李之亮点校：《宋史全文》卷24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下册，第1640页。

臣僚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服饰乱常、习为胡装，声音乱雅、好为胡乐。如插棹篦、不问男女，如吹鸂鶒，如拨胡琴，如作胡舞，所在而然。此皆小人喜新，初则效学以供戏笑，久习之为非，甚则上之人亦将乐之、与之俱化矣。臣窃伤悼，中原士民沦于左衽，延首企踵，欲自致于衣冠之化者，三数十年却不可得，而东南礼义之民，乃反堕于胡虏之习而不自知，甚可痛也。……伏望戒敕守臣，检坐绍兴三十一年指挥，严行禁止，犯者断罪，令众自然知惧矣。”诏从之。¹⁹

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不然亦间养余发，作椎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号曰“蹋踣”，可支数月或几年。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辮如鬼，反以为便。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女之服不其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²¹

入境，男子衣皆小窄，妇女衣衫皆极宽大……无贵贱，皆著尖头靴，所顶之巾，谓之蹋鞮。²²

就幔笠而言，虽然南宋晚期已经流行于金蒙占据的淮北地区，但对南宋本土并未产生太多影响。南宋灭亡之初、德祐二年（1276）二月，左相吴坚等人担任祈请使赴蒙，渡河进入金朝故地邳州，发现“自此，人皆戴笠，衣冠别矣”²³。随着蒙古对南宋的征服，原本带有异域、异族色彩的幔笠，很快在南方得到传播，并且成为时尚。宋濂在给南宋遗民、抚州士人李士华（1266-1351）所作墓志中

111

提到：

会宋亡为元，更易万笠、窄袖衫，处士独深衣幅巾，翱翔自如，人竞以为迂。处士笑曰：“我故国之人也，义当然尔”。²⁴

坚持不易故国衣冠，只是李士华这类少数遗民的行为。为求得仕机会，不少士人把戴笠、穿着北族服饰，作为向蒙古征服者表示顺服的标志。江南平定之初，文士胡长孺（1249—1323）被征入都，据说便是戴笠而往。《农田余话》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赵文敏孟頫、胡石塘长孺，至元中有以名闻于上，被召入。见问文敏：“会甚么？”奏曰：“做得文章，晓得琴棋书画。”次问石塘，奏曰：“臣晓得那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事。”时胡所戴笠相偏欹，上曰：“头上一个笠儿尚不端正，何以治国平天下！”竟不录用。²⁵

野史里的故事未必属实，但戴笠在元代江南的确是一时尚尚。至顺年间刊行的日用类书《事林广记》，谓：“笠子，古者虽出于外国，今世俗皆顶之。”²⁶从图像资料来看，戴幔笠者并没有族属或者社会阶层的限制。元代文学家虞集（1272-1348）的传世画像（参看图八），即



圖八



图九



圖十

头戴黑笠；而元末讽刺张士诚幕府文人的小令所谓“皂罗辫儿紧扎梢，头戴方檐帽”²⁷，描绘得大概也是类似的一个髡首辫发、头顶幔笠的文士形象。而福建将乐杨氏家族壁画墓中的舆夫仆役，所戴也是同种类型的笠子（参看图九）。

幔笠的流行，一直到元末不衰，甚至连皇帝亦不能免俗。现存元代帝王肖像，除去钹笠，亦有戴幔笠者。明人摹元周朗《天马图》中的元顺帝，即头戴尖顶幔笠（参看图十）。幔笠流行的区域，也不仅限于中国，而是随着蒙古大军的征服，传播到亚洲各地。

²⁴ 宋濂：《北麓处士李府君墓碣》，黄灵庚点校：《宋濂全集》卷69，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647页。

²⁵ 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39册，第333-334页。

²⁶ 《事林广记》后集卷10,《续修四库全书》第1218册,第373页。

²⁷瞿佑：《归田诗话》卷下，乔光辉：《瞿佑全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73页。

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尊其制……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²⁸

（高丽）唐初稍服五采……逮我中朝，岁同信使，屡赐裘衣，则渐渍华风，被服宠休，翕然不变，一遵我宋之制度焉，非徒解辫削衽而已也。³⁰

在九次残酷的抗蒙战争（1231-1273）失败之后，高丽被卷入蒙元世界体系。虽然忽必烈允许高丽不改冠服，身为蒙元驸马的高丽忠烈王（1274-1308 在位）为了表示彻底降顺，不仅自身“辫发胡服”，而且于 1278 年下令全国臣民衣装蒙古化：

（世祖）因问（高丽人）康守衡曰：“高丽服色何如？”对曰：“服鞞鞞衣帽。至迎诏贺节等时，以高丽服将事。”帝曰：“人谓朕禁高丽服，岂其然乎！汝国之礼，何遽废哉！”³²

²⁸ 《高丽史》卷2《太祖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2年，第一册，第26页。

²⁹ 赵浚：《松堂集》卷3，《韩国文集丛刊》第6册，第425页。

³⁰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七《冠服》。

³¹ 《高丽史》卷72《輿服》，第二册，第476页。

³² 《高丽史》卷28《忠烈王一》。

³³ 《高丽史》卷 105 《郑可臣传》。

笠”)和各司胥吏(着白方笠)的公服³⁴。



图十一



圖十二

不仅在东亚，蒙古征服者还将幔笠带到了中亚和西亚地区。高昌故城出土的回鹘文刻本佛本生故事插图，原本的印度人物，却均被冠以幔笠（参看图十一）。而在十四世纪初伊利汗国史家拉施特编纂的历史巨著《史集》当中，也出现了头戴幔笠的蒙古君王形象（参看图十二）。原本属于女真服饰的幔笠，在被蒙古人接受之后，随着蒙古马蹄到达了亚洲的各个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被视作蒙古征服冲决政权、族群与文化藩篱的一个象征。

四、重树藩篱：慢笠的淡出与东亚“夷夏”意识的消涨

十四世纪后期元帝国的衰亡，结束了不同族群文化自由交融的短暂历史。在蒙元帝国的废墟上，不仅政权之间的地理疆界，族群之间的文化与心理界限，也重新明晰起来。新建立的明帝国，同时面对着北元的军事压力和内部的合法性危机；其解决策略之一，便是重新标举儒家“华夷之辨”的旗帜，宣布在文化上“用夏变夷”、“复我中国先王之旧”，以去“蒙古化”运动，来塑造政权的正统性³⁵。这一政治和文化的剧变，迅即在东亚世界产生影响。

正如洪武元年胡服禁令所说，明朝新建立的服饰制度，其目标是要恢复唐制度。改易衣冠，是因“陋胡人旄头之制、草场简便之风”，



图十三

³⁴ 《高丽史》卷72《輿服一》。

³⁵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参看拙著《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而“特慕唐朝尊重之俗”；政府也希望借此引领风俗，“共成复古之盛”³⁶。作为“胡元”马上之习、“奢侈粗戾”之风的一部分，幔笠和其他金元北族服饰、发式一道，或被禁止、或被限制在特殊场合使用。禁革之后，幔笠已基本不见于明代图像资料——需要指出的是，某些研究所引用的少数“明代”幔笠形象，要么是误判材料年代（如《宝宁寺明代水陆画》，参看图十三），要么是使用的是明代重刊的元代资料

（如万历重刊本李孝美《墨谱》，参看图十四），这些图像并不能反映明代社会生活的实态，却容易让研究者坠入“以图证史的陷阱”³⁷

下面的故事说明，在禁革胡服百年之后，明朝人对幔笠已经相当陌生。弘治元年（1488），朝鲜官员崔溥因风飘至浙江，因在丧中，崔氏头戴“深笠”（即幔笠，在朝鲜演变为丧服之一，详下），这种奇特的造型很快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桃渚所千户陈华）与一官人来看臣，指臣笠曰：“此何帽子？”臣曰：“此丧笠也。国俗皆庐墓三年，不幸如我漂流，或不得已有远行者，则不敢仰见天日，以坚泣血之心，所以有此深笠也”。³⁸



图十四

这种深簷遮掩、不见天日的笠子，明人看来颇为奇异，崔溥不得不多费唇舌加以解释。然而，一百余年之前，它还流行在江南地区，上自学士大夫、下至舆夫仆役，靡不风从。这个例子说明，随着元明易代，幔笠已经退出了明人日常生活。

蒙元帝国崩溃后，幔笠在朝鲜半岛的遭遇，也与中国类似。部分源于丽末的国家独立意识、部分受到明朝影响，丽末鲜初的朝鲜半岛，也发生了一场革除“胡服”运动。明朝以复古为号召的服饰改革，迅速被丽末儒臣视为“华夏”文明复兴的表征。在明丽宗藩关系建立过程中，高丽屡次遣使请求袭用“大明衣冠”，以此向明朝展示“慕华向化”之心；而革除蒙元服饰、接受明朝衣冠，在高丽内部还被赋予了“追复（高丽）祖宗之盛”的特殊意义³⁹。

在高丽恭愍王时期，幔笠一度成为“代言班主”以上高官的公服。而在仿明制建立起来的李朝服

³⁶ 刘夏：《刘尚宾文续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326册，页155。

³⁷ 关于历史研究中图像使用需要注意的问题，参看缪哲：《以图证史的陷阱》，载《读书》2005年第2期。

³⁸ 崔溥：《漂海录》，葛振家点校本，线装书局2002年，第62页。

³⁹ 高丽接受明朝衣冠、改革“胡服”的过程，参看拙作：《衣冠与认同：明初朝鲜半岛袭用“大明衣冠”历程初探》，载《史林》2017年第1期。

饰体系里，幔笠被规定为“乡吏”阶层的常服⁴⁰。李朝初年规定，乡吏不得以闲良人员充任；在官吏群体当中，乡吏保留胜国服饰、不与新朝之制，无疑有贱辱之意。这与明初命宦官剃蒙古式“一搭头”、命皂隶戴插羽小帽，异曲同工。因此，朝鲜成宗三年（1472），礼曹要求平安道乡吏与他处一样、遵照《经国大典》穿戴“黑竹方笠”，便遭到激烈抵制：

平安道江西县吏康翰等上言启：“本道诸邑乡吏，率以良民假属，故并着草笠，其来已久，不可依他道例著方笠，请仍旧”。从之。⁴¹

连“良民”出身的乡吏，都不愿意佩戴显示其微贱地位的幔笠，士大夫更无人乐意。因此，正如前文崔溥所言，只有在居丧外出时因穿著丧服不便，才头顶深簷幔笠，以示“不敢仰见天日，以竖泣血之心”。幔笠在朝鲜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外出临时穿著的丧服。孝宗时，许积和国君讨论冠服制度，即称“前朝（高丽）士大夫着四角笠，即今丧人所着方笠也”⁴²。

由高官服饰沦为权便的丧服，幔笠地位一落千丈。然而，随着朝鲜士人“小中华”意识的不断强化，幔笠的丧服资格，也几乎不保。丁卯、丙子胡乱之后，学者开始质疑幔笠的源起、讨论居丧穿着是否合适。例如，郑经世（1563-1633）在回答学者是否应以“平凉笠”取代原为“胡金之制”的方笠时，认为居丧外出，也应穿着丧服、不可苟简⁴³。李光庭（1674—1756）意见比较暧昧，认为“方笠虽曰胡金之制，先儒居丧，亦多以深衣方笠出入者”，是“衰经不可以行道”的不得已之举⁴⁴。李德懋（1741-1793）的态度，则甚为决然：

方笠是金人之服，丽末宰相戴之，我朝中叶胥吏戴之，今则为丧人所著。其制尤为怪骇。东

国丧服粗具礼制，而头著虏笠，不可不改正者也。⁴⁵

源于“胡金”的幔笠不仅淡出了民众日常生活，而且在强烈的夷夏情节之下，连作为权宜丧服也受到质疑和抵制。这与蒙元时代上自帝王、下至民庶靡然风从的盛况相比，无疑有天壤之别。幔笠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盛衰，竟然一定程度上成为知识阶层夷夏意识消涨的指针。

⁴⁰ 朝鲜总督府中枢院印行：《经国大典》卷3《礼典·仪章》，1934年，第231页。

⁴¹ 《成宗大王实录》卷 21, 成宗三年八月丁丑, (韩国) 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朝鲜王朝实录》, 1968 年, 第 8 册, 第 680 页; 卷 26, 成宗四年正月壬寅,《朝鲜王朝实录》第 9 册, 第 2 页。

⁴² 《孝宗大王实录》卷 18, 孝宗八年正月壬辰, 《朝鲜王朝实录》第 36 册, 第 74 页。

⁴³ 郑经世：《愚伏集》卷11《答金伯晶问目（戊午）》，《韩国文集丛刊》第68册，第209页。

⁴⁴ 李光庭：《讷隐集》卷5《答辛与则（师锡）问目》，《韩国文集丛刊》第187册，第223页。

⁴⁵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61《论诸筭》，《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第94页。

五. 结语：小物件与大历史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知道,长期以来被误名为“瓦楞帽”、并被视作典型蒙古服饰的幔笠,其实是一种起源于女真的帽式。虽然只是一顶小小的笠子,它的流行盛衰史,却如同标志物一般,直观地反映了十二至十四世纪东亚族群与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及东亚儒家文化圈内华夷胡汉观念的消涨。

带有浓郁北方民族风格的幔笠，金代后期已在中原民众当中流行。宋室南渡之后，中原故土化作南方士人眼中的文化异域，衣冠、风俗上的“华夷之辨”，阻遏了幔笠向南传播。高丽虽与辽金壤地相接，但文化上的“慕华”心态，使他们对游牧民族服饰心存芥蒂。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征服运动，不仅冲决了东亚大陆各政权间的地理疆界，而且荡涤了各族群间的文化藩篱。幔笠也在此时伴着蒙古人的马蹄，传播到亚洲各地。随着夷夏意识的淡化，在潮流裹挟与利益诱惑下，北人衣冠成为江南的一时风尚。高丽则以自上而下激进“胡化”的方式，接纳了“鞑鞴衣帽”。正是在这种政治和思想背景中，幔笠在东亚风靡一时。蒙元帝国的崩溃，标志着各族群文化自由融合时代的结束。在蒙元旧基上崛起的新兴王朝，开始重新划定政权与文化的边界。在日益激烈的夷夏情节影响下，幔笠淡出民众的日常生活，化作了历史陈迹，以至今日可以作为图像文献断代的标尺（参看图十七、十八）。小小的幔笠，成为了蒙元帝国前后政治与文化变迁的缩影。



圖十五



图十六

图片说明

图一：《打双陆》，元至顺刊《事林广记》续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 1218 册。

图二：日本覆明洪武四年刊本《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 15 册。

图三：曾鲸绘《张卿子像》

图四：《女真乐舞图》，《金代乐舞杂剧石刻的新发现》，《文物》1991 年第 12 期。

图五：大安二年侯马董玘墓砖雕，取自《平阳金墓砖雕》。

图六：《醉归乐舞图》，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画（至元六年），《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第 7 册。

图七：王青墓出土藤幔笠，《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 年第 10 期。

图八：虞集像，元佚名《名贤四像》，《元画全集》第四卷第五册。

图九：《人物轿輿图》（局部），福建将乐元代墓室壁画，《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第十册。

图十：明人摹周朗《天马图》，《故宫藏品大系·绘画编》第五册。

图十一：蒙元回鹘文刻本佛本生故事插图残片。

图十二：《史集》插图中的蒙古君主。

图十三：《误死针医横遭毒药严寒众》（局部），出《宝宁寺明代水陆画》。

图十四：《和制》，出万历重刊本李孝美《墨谱》插图。

图十五：旧题《宋佚名百子图》，《宋画全集》第六卷第二册。

图十六：旧题《道子墨宝·地狱变相图》（局部），《宋画全集》第六卷第二册。

作者简历

葛兆光 / Ge Zhaoguang

1950年出生于上海。198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献学硕士毕业。1992年起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2006-13年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教授。现为该研究院及复旦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2009年当选为第一届普林斯顿全球学者。

专业领域是中国思想史、东亚交流史。

主要著作：《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中国再考》（获日本第26届亚洲太平洋大奖）等。

四日市 康博 / Yokkaichi Yasuhiro

1996年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毕业。2004年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学分修满退学。2007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2005/4-2008/3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专任讲师（付任期）。2009年~驹泽大学文学部非常勤讲师。2012年~早稻田大学综合研究机构中央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所招聘研究员。2014年~昭和女子大学国际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蒙古帝国时期的东西欧亚交流史，海域亚洲交流史。

主要著作：《从器物看海域亚洲史——蒙古到宋元时代的亚洲与日本的交流》（福岡：九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

朝克图 / Borjigen Chogt

1963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1980年9月至1984年7月就读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学院，1984年7月起在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学院担任助教，1985年3月至1987年1月北京大学语言学院学习波斯语，1993年9月至1997年6月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研究所女真语专业硕士就读，1997年6月至1998年3月日本富山大学文学部外国人研究院，1998

年4月至2000年3月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访问学者，2000年4月至2006年7月就读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博士就读，2006年8月开始就职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2007年升任副教授，2012年聘为教授

主要著作：《成吉思汗的法》（山川出版社，2010年）从1990年代起先后发表三十余篇有关蒙古帝国、元朝历史的学术论文

桥本雄 / Hashimoto Yu

1972年生于日本东京。199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2000年，东京大学博士课程满期退学，2004年获得博士（文学）学位。

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九州国立博物馆成立准备室、学艺部研究员，现为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中世时期的国家交流史和文化史。

主要著作：《中世日本国际关系》（吉川弘文馆，2005年），《伪装的外交使节》（历史文化丛书，吉川弘文馆，2012年），《“日本国王”与勘合贸易 足利将军家为何要向中国皇帝“朝贡”？》（追溯日本史：外交篇（7）室町时代，NHK出版，2013年）等。

额尔敦巴特尔 / Eerdunbateer

1967年1月生，男，内蒙古人。1991年7月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文学学士），1995年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取得硕士学位。同年，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工作从事副研究员工作，并就读于韩国韩国江原国立大学史学科博士课程。2001年修了。2006年，在江源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获得博士学位。2013年9月~2014年9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元朝与高丽关系史、韩半岛的历史及文明，以及契丹、女真语言文字研究。

主要著作：《简论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比较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3，1996）、《大蒙古国与高丽》（专著），韩国慧眼出版社，

2009)·《高丽王室与元晋王家族的关系》(韩国蒙古学学会主办《蒙古学》35, 2013)。

向 正树 / Mukai Masaki

1974年11月21日生于福冈县北九州市。1998年3月毕业于大阪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学专业)。2003年~2005年,留学于北京大学历史系。2007年3月,毕业于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文化形态论专业)博士后期课程。2007~2012年,担任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特聘研究员。2013年4月至今,任同志社大学全球地域文化学部副教授。

主要著作:《第二章 蒙古:海洋力量的结构与变迁》(收录于《世界历史与帝国》,秋田茂、桃木至朗编,大阪大学出版会, April-2013, pp.71-106.)

《元代“朝贡”与南海信息》(《元史论丛》10, 中国元史研究会), July-2005, pp.389-406.)

孙卫国 / Sun Weiguo

1966年生,男,湖南衡东人。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获得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8)、香港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1)。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赴韩国高丽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香港城市大学和台湾大学为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韩国史、中韩关系史、中国史学史和明清史。

主要著作:《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年)、《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金 甫桃 / Kim Bo-Kwang

2012.05.-2014.02. 高丽大学韩国史研究所研究教授, 2014.03.-2016.02. 高丽大学 BK21PLUS 韩国史事业团研究教授, 2017.03.- 至今 嘉泉(Gachon)大学 Liberal Arts College 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 高丽的政治制度, 权力构成等。

主要著作:《高丽成宗显宗时代太祖配享功臣的选定过程及意义(2014 探究高丽前期鱼袋的概念与运营方式(2015)》,《高丽蒙古关系的进展以及达鲁花赤的置废过程(2015)》,《高丽对蒙论理及“大国印象”——以 1231, 1232 年外交文书为中心——(2015)》,《高丽前期公服制的整顿过程研究(2016)》,《高丽内部达鲁花赤的存在状态及影响——通过达鲁花赤的蒙古统治方式经验——(2016)》。

李 命美 / Lee, Myungmi

首尔大学国史学系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在首尔大学历史研究所, 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等地工作, 现就职于人文科学研究院, 担任研究员。研究国家之间的关系(东亚关系形成方式)以及个人·家族之间关系(蒙古关系形成方式)在高丽-蒙古关系中协调的模式, 以及受其风波高丽末期的政治、社会的变动。

主要著作: 硕士论文主题为《高丽与元朝王室通婚的开展与特征》, 博士学位论文主题为《高丽-蒙古关系与高丽国王地位变化》(2016, 《探究 13~14 世纪高丽·蒙古关系研究-征东行省丞相驸马高丽国王的多元地位》, 惠安)。

赵阮 / Cho Won (汉阳大学)
 朝克图 / Chogt, Borjigen (内蒙古大学)
 额尔敦 / 巴特儿 Eerdunbateer (内蒙古大学)
 桥本雄 / Hashimoto Yu (北海道大学)
 金甫桢 / Kim Bokwang (嘉泉大学)
 李命美 / Lee Myungmi (首尔大学)
 向正树 / Mukai Masaki (同志社大学)
 孙卫国 / Sun Weiguo (南开大学)
 其林道尔吉 / Tserendorj, Tsegmed (蒙古国社会科学院)
 四日市康博 / Yokkaichi Yasuhiro (昭和女子大学)
 张佳 / Zhang Jia (复旦大学)

赵珙 / Cho Kwang (国史编纂委员会)
葛兆光 / Ge Zhaoguang (复旦大学)
刘杰 / Liu Jie (早稻田大学)
三谷博 / Mitani Hiroshi (跡见女子学园大学)

荒木和宪 / Araki Kazunori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崔永昌 / Choi Youngchang (国立晋州博物馆)
榎本涉 / Enomoto Ayumu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韩承勋 / Han Seunghoon (高丽大学)
贵田洁 / Kida Kiyoshi (静冈大学)
村和明 / Mura Kazuaki (三井文库)
佐藤雄基 / Sato Yuuki (立教大学)
山内晋次 / Yamauchi Shinji (神户女子大学)
八百启介 / Yao Keisuke (北九州市立大学)

安映姬 / Ahn Younghee (首尔外国语学院大学)
丁莉 / Ding Li (北京大学)
李惠利 / Lee Hyeri (韩国外国语大学)
李金花 / Lee Jinhua (自由职业者)
朴贤 / Piao Xian (自由职业者)
宋刚 / Song Gang (北京外国语大学)

洪性珉 / Hong Sung-min (早稲田大学)
全相律 / Jeon Sangryul (东京大学)
宋晗 / Song Han (东京大学)
孙军悦 / Sun Junyue (明治大学)
朱琳 / Zhu Lin (東北大)

金范洙 / Kim Bumsu (东京学艺大学)
金罔泰 / Kim Kyongtae (高丽大学)
李恩民 / Li Enmin (樱美林大学)
娜荷芽 / Naheya (内蒙古大学)
彭浩 / Peng Hao (大阪市立大学)
许静波 / Xu Jingbo (复旦大学)

陶 韡烁 / Tao Weishuo (复旦大学)

长井亚弓 / Nagai Ayumi (編集者)

今西淳子 / Imanishi Junko (渥美财团)
角田英一 / Tsunoda Eiichi (渥美财团)
石井庆子 / Ishii Keiko (渥美财团)
本多康子 / Honda Yasuko (渥美财团)

第2次“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圆桌会议
“蒙古袭来与13世纪蒙古帝国的国际化”
—发表资料集—

发行责任人 今西淳子

© 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 Copying is Prohibited.For inquiries or quotes,please contact us.